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
2003年6月，頁169~221

BIBLID1012-8514(2003)31p.169-221
2003.5.2收稿，2003.5.29通過刊登

殖民與再殖民
——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

鍾　淑　敏*

提　要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軍入侵海南島北岸的海口。自此，海南島為日軍所控制，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為止，經歷了長達六年餘的日本占領時期。日軍之占領海南島，首要目的在於獲取以鐵礦為主的資源，並且意圖以此地為南進基地。配合軍事占領的同時，「臺灣經驗」在民政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什麼是「臺灣經驗」？簡而言之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所累積的政治、經濟、社會、產業等各方面的「經驗」。其中最顯著的是農林產業、調查事業、熱帶醫學、警察行政及宣撫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海軍特務部的官員過半數是臺灣總督府關係者，形成民政主軸，這種人事面的結合有利於臺灣經驗的移植。而在民間事業方面，以臺銀、臺拓為首的臺灣主要企業、商社相繼前來，大量人力、物力、資金集中投入的結果，使海南島一時之間成了「第二個臺灣」。而海南島以米糖為中心的農政，又正好讓臺灣得以發揮「米糖經濟」的經驗。但是，殖民地經濟中最根本的「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現象，卻也如實的呈現。因此，臺灣在海南島最大的開發事業，即石碌鐵礦的開採及其周邊工程上缺席，僅能扮演後方支援的角色，此也正顯示出殖民地臺灣的限制。

關鍵詞：殖民　臺灣總督府　日本帝國　南進政策　海南島　臺灣拓殖會社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前言
一、日軍占領前海南島的開發
二、臺灣總督府對海南島之覬覦
三、海南島的日本軍政
四、臺灣對海南島軍政的配合
五、結語

前言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在日本海軍的主導下，由近藤信竹中將統帥的第五艦隊與陸軍第二十一軍（以飯田祥二郎少將所率領的臺灣混成旅團為主體）聯合作戰，入侵海南島北岸的海口，而後陸續攻陷西北、東南的港口。二月十四日，臺灣混成旅團自海南島南部的三亞登陸，占領榆林港後相次攻下西部口岸。在日軍自海島四面而來的攻擊下，中國方面駐守海南島的保安第五旅與瓊崖守備司令王毅所率部隊，幾乎全無抵抗的退守山區。自此，海南島淪落日軍的控制，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為止，經歷了長達六年餘的日本占領時期。

這段日軍占領期間，「臺灣經驗」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什麼是「臺灣經驗」？簡而言之，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所累積的政治、經濟、社會、產業等各方面的「經驗」。著名的經濟雜誌《ダイヤモンド》（鑽石）記者石山賢吉對此有極深入的觀察：

> 日本一占領海南島，便突然重視起臺灣來。這是因為統治海南島時臺灣的經驗非常有效之故。簡言之，巡查之類的與其自內地帶來，還不如在臺灣的巡查好，因為他們對氣候也習慣了，也有處置中國人的經驗。勞動者也是臺灣人恰恰好用。而在農作物方面，臺灣的經驗也可以照樣應用。這回，對海南島的開發，我海軍當局歡迎有資本及技術者，採取讓有經驗、實力者開發的方針。我海軍依據此

> 方針，對各個符合資格者分與海南島土地，結果共有三十餘會社獲指定分擔海南島之開發。然而，如今這些會社對海南島的開發並不太熱衷，採取機會主義。雖說如此，倒也不是他們存心偷懶，而是因為他們的經驗都是內地的經驗，對熱帶農業並不熟悉，因而完全無法出手。但是，其中有一個展露頭角的會社，那就是臺灣拓殖。臺拓又試作又整地的，成效十分顯著。之所以如此，乃因臺拓在臺灣的農業開發上有經驗所致。……其他所有臺灣的經驗在海南島也都有用。就是疾病，也是熱帶地方特有的疾病。其治療法在臺灣也有研究，不久此也將成為裨益海南島人之事。連要征服這裡的毒蛇，也必須有臺灣經驗。種種的臺灣經驗，在海南島的開發上，不知道有多大的作用？這正是臺灣統治的苦心所獲得的回報。同時，也正是臺灣盡其南進基地的使命。[1]

這段敘述，雖然稍嫌籠統，但卻很明確的指出日本的治臺經驗對統治新占領地區的作用。本文即是要藉著重建日軍占領海南島時期的臺灣關係圖像，對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這個古老的課題重新加以檢討。

在研究史上，關於日軍占領海南島的問題，歷來有幾個面向的討論。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自「海軍與南進」的課題出發，而觸及海南島的占領，這方面累積了不少的成果。[2]其重點在於日本陸海軍於「北進」與「南進」的擴張方向爭議上的政治過程，以及此擴張方向如何與汪精衛政權及要維護既有利益的列強妥協而獲得實現的問題。至於「海軍軍政」下的海南島，除了水野明依據海南海軍特務部編的〈海南島三省連絡會議決議事項抄錄〉等一手資料加以論述外，[3]並不多見。

---

1 石山賢吉，《紀行滿洲臺灣海南島》（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2），588~590。

2 最近的研究成果有岸田健司，〈日本海軍の「南進」政策と海南島進出〉，《日本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年報》第 20 號（1990，東京）、相澤淳，〈海軍良識派と南進—海南島進出問題を中心にして—〉，《軍事史學》第 99、100 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發生と擴大—」（1990，東京）。

3 水野明教授所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包括〈海南島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 49 卷第 1 號（2001.8，名古屋）、〈日本海軍の海南島支配——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一）（二），《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 49

中國方面對日本占領海南島的問題，也在最近才逐漸有「紅軍及蘇區的抗戰」之外的課題，如王裕秋、張興言、房建昌，以及李琳之相關論述。[4]這些論文的特色，主要是依據日本大藏省於戰後所編的《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歷史的調查》（有關日本人的海外活動之歷史調查）等資料及一般戰史，強調在日軍的統籌之下，日本的各大會社對海南島農林、工礦等資源的掠奪。至於臺灣方面，有鄭麗玲對臺灣人的「海南島經驗」的討論[5]及蘇雲峰對近代以來海南島的一系列研究。[6]此外，臺灣拓殖㈱式會社的檔案開放利用後，由於海南島是臺拓事業的重心，因此也陸續有相關的研究成果。[7]

在上述的研究史中，與本文討論主題最接近的是蘇雲峰的作品。蘇雲峰基於對鄉土的關愛，在一系列的作品中比較清末新政以來臺灣與海南島的歷史發展，試圖對何以「臺灣能，海南島不能？」的問題提出解釋，指出「臺灣經驗」在海南島的幾個發展時期具有正面的作用。本文是筆者對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研究的一環，探討臺灣在日本對外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此課題以近代日本史的角度觀之，是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臺灣因素」的探討；而自臺灣史的角度言，則可以說是臺灣「對外

卷第 2、3 號（2001.12~2002.2）等作品。

4 李琳，〈日本占領海南及其對資源的開發和掠奪〉，《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 2 期（1997，海口）。王裕秋、張興言，〈日本侵占海南時期的經濟「開發」政策及活動〉，《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 1 期（2000，海口）。房建昌，〈關於日本侵掠海南島的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3 期（北京）。

5 如鄭麗玲對海南島原臺灣人日本兵及臺北帝大調查的研究，見〈海南島的臺灣兵（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臺灣風物》第 46 卷 3 期（1996，臺北）及〈臺北帝國大學與海南島—以海南島的學術調查為中心〉，《臺灣風物》49 卷 4 期（1999，臺北）。

6 蘇雲峰將歷來對海南島的重要研究，集結為《海南歷史論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7 本人於前年發表〈臺灣總督府與南進—以臺拓在海南島為中心〉一文於中研院社科所之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上（該文正修改中），而 Justin Adam Schneider 的博士論文 *The Business of Empire: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aiwan,1936-1946*（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8）中有專章討論臺拓在海南島的事業擴張狀況。

發展史」之一環。本文並將透過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產生的「臺灣經驗」如何落實於海南島「軍政」的分析，以探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質。

一、日軍占領前海南島的開發

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清朝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聲明不以海南島（瓊州）讓與他國。如同與日本簽署福建不割讓給其他國家的條款般，對法國而言，取得中南半島的安南、柬埔寨等地的殖民統治權後，也於臨近的海南島上獲得了特殊地位。對於此特殊地位的承認，從一九〇五年法國殖民地部長派遣雷吉納樂德．康（Réginald Kann，1876~1925）到遠東考察的理由中，明顯可見法國對海南島的關心。雷吉納樂德．康於一九〇六年到臺灣，他認為：

> 日本人的殖民化工作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碰到的類似問題，代表著特定的利益。似乎有必要去研究一個遠東強國如何征服，如何安撫以及治理一個很像中國南方省份，而且幾乎與海南島相同的中國地區。萬一事情演變成類似一八八五年需要報復的情況時，海南島就是法國預定的目標。該島在法國征服了（越南）北圻，尤其是租借廣州灣領地之後，就處於我們直接的勢力範圍之內……[8]

從這裡明顯的可以看到法國將海南島視為勢力範圍的意圖。不過，儘管一八九七年法國獲得清廷的承諾，在海口設立領事館，並於翌年與清廷交涉將榆林港建設為軍港，但此交涉並未成功。而後法國除了在海口有天主教關係的教會一、修道院一、學校二、醫院一等相關設施外，[9]實際上並未能真正將海南島納入其勢力範圍。

海口在一八五八年的四國天津條約後，成為通商口岸。然而，各國在海南島的經營並未持續。依據一九三七年五月的調查，居留海南島之

8 Réginald Kann 原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圖書館藏，2001），前言，3。

9 南支調查會編，《海南島讀本》（東京：南支調查會，1939），174~175。

外國人僅有美國人四十九名（以傳教士及醫護人員為主）、法國人十二名、日本人（勝間田家）三名、英國人一名而已。至於領事館方面，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於一九三六年排英運動時、法國於一九三〇年為節省經費業已分別關閉，殘留的代表外國勢力的建築物，僅有美國標準石油及英國亞細亞石油的倉庫而已。[10]至於一向是涉外關係重點的教會，主要有天主教及屬於美國長老會的中華基督教。天主教有教堂十二、附屬學校四、育嬰堂一，信徒約千人。長老會發展甚速，勢力甚且及於內陸黎人境內。如那大有福音堂一、醫院一、高等小學校二，位於海岸的海口、瓊山、嘉積甚至有中學的設置。[11]但是，這個僻處中國邊隅的島嶼，卻由於位處英國的香港與新加坡、美國的菲律賓、法國的中南半島及日本的臺灣之間，戰略地位重要。因此，儘管各國皆無重大利益糾葛，仍然備受注目。

從海南島本身的發展來看，清末以來除了與中國各地一樣歷經政治社會動亂外，同時由於位處廣東省的邊隅，更是經濟開發的末梢。然而，由於其為主要的華僑送出地區，運用華僑財力以促進地方發展的構想，曾經幾度付諸實現，如一九〇八年時的僑興實業公司。時清政府為吸引華僑投資開發海南，內命南洋華僑區慕頤等人集資，予其官有土地開墾之便，主要事業有崖縣、三亞港、昌江登頭製鹽，儋縣、那大栽培橡膠、開採錫礦等。[12]一九〇八年華僑胡子春投資興建三亞港大規模鹽田，此後，全島鹽業公司發展到一百二十多家。民國以後，一九一二年華僑林天嶷、黃有淵、陳昌運等創立清瀾商埠有限公司，修碼頭、建貨舍、購買船隻、開發航運。一九一五年華僑姚如軒等人合股興辦瓊郡啟明電燈公司，這是海南使用電力之始。一九一八年華僑陳華農等創設瓊海汽車公司，自此，海口至文昌、瓊山等十幾條公路和行車公司，以及從海口開往泰國、新加坡、馬來亞的海運，幾乎都由華僑投資創辦及經營。另

10 長谷川了，〈海南島を繞る國際關係〉，《海と空　臨時號》8卷5期「海南島專輯」（1939，東京），64。

11 川島元，《海南島の話》（東京：新生堂，1939），55~60。

12 村上勝太，《海南島事情》第三（臺北：總督府調查課，1922），125~127。

外，海南華僑還在海口、嘉積、三亞等市鎮，投資興辦了織造、製皮等二十多種手工業企業。[13]總而言之，此時期海南的發展幾乎完全仰賴華僑資金，但是開發的限制也極為明顯。「以農業而言，其所引入的南洋經驗的貢獻是奠定栽植橡膠與咖啡的基礎，為後期所承續，但其缺點在沒有農業改良的全面發展規劃，尤其未曾關注海南長期以來所依賴進口的糧食作物問題」。[14]

另一個開發海南島的時機是一九二〇年前後的廣東政府。當時廣東政府有意開發海南島富源，卻苦無資金、技術等，因之有求助於臺灣總督府的構想。時臺灣總督正是「南洋協會會頭」田健治郎。在田健治郎一九二一年的日記中，留有若干廣東政府求援的線索：

> 澀澤榮一男來述，孫文秘書山田純三郎關海南島開拓事業求我邦人之贊助之企圖，叩予所見。則詳述關同島調查及開墾計畫從來之經過答之。（8 月 9 日）。
>
> 午前，山田純三郎、菊池良一以澀澤子外三人添簡來訪，述廣東政府特使馬育航之企圖，關海南島開發之計畫，切望我總督府之援助及實地調查之決行。（8 月 11 日）。
>
> 阿部局長來稟申左記要件，予對之口授復答之旨趣，尚指命左記諸件之調查：一、關山田純一〔三〕郎申請海南島開發調查費支出之件。（8 月 12 日）。[15]

日記中所出現的男爵澀澤榮一是明治維新以來的財界要人，山田純三郎是為中國革命喪生的日人山田良政之弟，與革命黨人來往密切，甚至是孫文臨終時唯一在場的日本人。由此，在孫中山所規劃的《建國方略》中，將榆林港闢為南方大港的構想，也就不那麼突兀了。

又在田健治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加〔賀〕

13 謝鵬飛，〈海外海南人群體的形成及其業績〉，收入符和積編，《海南文史資料》第6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148。

14 蘇雲峰，〈從南洋經驗到臺灣經驗〉，《海南歷史論文集》，159。

15 〈田健治郎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圖書館藏。

來長官病漸輕快，來訪談左記要件：一、關林鶴壽被擬海南島總督之消息。一、關西沙島燐礦開發之事」的記事。此時正是瓊崖督辦李根源以興辦實業為名向臺灣日商借款數百萬元，被上海報界攻擊為軍政府有賣瓊州之意，迫使李根源不得不停止簽約之時。[16]旅居上海的臺灣板橋林家三房的林鶴壽何以有被擬為「海南島總督」的傳聞？實在令人費解。[17]至於西沙島的燐礦開發，據說是在總督府專賣局局長池田幸甚授意下，以廣東人何瑞年之名義組織「西沙群島實業無限公司」向廣東省政府申請開發。由於海南人王樹人不服，控告至農商部，謂何某係與日本人勾結，侵佔西沙群島，引起各方反對。直拖到一九二八年，才被南區善後公署撤銷此開發案。[18]

海南島另一個開發熱潮是北伐後至抗戰前夕，這與陳銘樞、林雲陔、黃強、陳漢光及宋子文等關鍵人物的存在息息相關，[19]也當然有其時代背景。一則由於九一八事變後全國經濟委員會提出對西北及西南的開發計畫，海南島即是西南開發的一環；一則含有救濟華僑的意圖。當然，日本對海南島的覬覦，應該也是中國加速開發海南島的原因。與前期最大的差異，是廣東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瓊崖實業局」所主導的品種改良工作。該局引進甘蔗苗如南大青、臺灣一〇四、臺灣

16 蘇雲峰，〈從南洋經驗到臺灣經驗〉，《海南歷史論文集》，140~141。又據總督府官僚水越幸一之談話，孫文曾經為籌軍費，而向明石元二郎總督提出以三百萬元出賣海南島的提案。此外，龍濟光（中華革命軍上將）兄弟也曾經透過永井啟次郎以海南島的資源為擔保，向日本財界借款一千三百萬元。見伊藤金次郎，《曉の海南島》（大阪：忠文館，1942），29~32。

17 林鶴壽是板橋林家三房，在長期與大房林熊徵爭奪林本源製糖社長職後，1917年將林糖賣給鈴木商店，而後遷徙至上海定居。參見許雪姬，〈日據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686~687。

18 蘇雲峰，〈從海南與南海的史地關係論南海主權之歸屬〉，《海南歷史論文集》，190。另據符駿書，謂一九二二年時廣東當局以該公司確有勾結日人，遂將其承辦權註銷。至民國十五至十六年間，又有馮英彪者申請採取西沙群島鳥糞，也因被察知係日人暗中策動而未獲准。參見符駿，《南海四沙群島》（臺北：世紀書局，1982），112~115。

19 蘇雲峰，〈從南洋經驗到臺灣經驗〉，《海南歷史論文集》，142~148。

一一四、菲律賓竹蔗等，旱稻如東莞白、金鳳五號等，水稻如臺中六十五號及外來種牲畜等，在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的調查、試驗、試作之配合下，農業改良方面獲得了初步成果。[20]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返回故鄉文昌視察，翌年一月，廣東省建設廳規劃了開發的四期計畫，認為開發要以交通機關及港灣的改良為第一要義。這主要包括循環鐵路的建設（海口—文昌—榆林—崖縣—昌江—臨高—瓊山，全長四百五十哩）、公路的大擴張、港灣的改善等事業。[21]四月，香港華商總會邀集上海及廣東各界有力人士組織海南島事業考察團，六月，宋子文也在第二次考察海南島後，歸途於香港發表具體的開發案，以求當地銀行之協助。英國資本對鐵路建設感到興趣，並且派遣測量隊前往。[22]一九三七年三月廣東省第九行政督察專員黃強，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商務參議一名同往海南島，展開開發之調查。[23]翌年二月，黃強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提出資金一千萬元的「海南島開發意見書」，[24]會中決定海南島開發要綱包括：設立開發機關、海陸交通建設、農林、水利、農村建設及黎人之歸化等事項。其中農村建設包括金融之調整、土地分配、封建勢力之驅逐、農村教育之普及、合作事業及副業之獎勵、道路之修築及衛生設備之完備等，[25]在在都顯示了海南開始有發展的契機。在鐵路的測量方面，由張海萍擔任瓊崖鐵路籌備處主任統籌，在一九三七年間分四組測量完成，然而因資金問題，只完成基本工事便中止。[26]

20 蘇雲峰，〈從南洋經驗到臺灣經驗〉，《海南歷史論文集》，142~148。柴山武德，《海南島》（東京：日本拓殖協會，1942），174~177。

21 臺灣總督府臨時南支調查局編，《海南島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南支調查局，1938），68~69。

22 東亞問題調查會，《香港と海南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104~108。

23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支那事變於ける帝國海軍の行動（其の二）續》（東京：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39），65。

24 東亞問題調查會，《香港と海南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107。

25 柴山武德，《海南島》（東京：日本拓殖協會，1942），12~13。

26 是安正利，《產業上ヨリ視タル海南島》（東京：滿鐵調查部，1940），98~100。

而在獎勵華僑投資方面，「一九三五年間，廣東省政府建設廳派朱赤霓為海南島實業局長，因朱氏曾在南洋興辦實業，專營錫礦，素孚僑望……。前九區專員黃強對贊助華僑回海南島興辦實業，更不遺餘力」。[27]海南島在抗戰以前，曾因中國農村破產，南洋群島各地林業、礦業和園林等實業一度衰落，僑胞驟遭失業，痛苦萬分，因之廣東省政府之開發海南島，也含有救濟華僑之意。

> 經此獎勵和鼓吹之後，一時南洋各屬華僑紛紛返國，向本島各地競相投資。像從荷屬回來的華僑，專門栽種樹膠，從事開墾和栽植等實業，地點多在陵水、三亞、藤橋、保亭等一帶地方。英屬華僑專門經營礦產，因為他們過去都在馬來亞從事開發錫礦，地點多在儋縣、那大、白沙縣、南豐、南辰一帶地方。菲律賓來的華僑，平日擅長種蔗和製糖實業，故在福山一帶從事種蔗，設糖廠專門製造土糖，其餘像省港各地來的般商，多數在澄邁縣屬福山市平原地區，廣置田畝，從事栽種香蕉，甘蔗入手。時島中開礦、墾荒、種植、畜牧等實業都興盛起來。[28]

海南島一時之間有欣欣向榮之色。

中國政府間歇性的推動海南島的經濟建設，以及華僑的投資，雖然有利於該島的發展，然而，直至日本占領時期，海南島的經濟狀況，整體而言仍然是生產力低落、勞力不足但工資低廉，無法自給自足的地區。農業勞動力主要是女性，文昌縣的耕作者甚至有九成是女性，[29]究其原因，似乎與移民南洋不無關係。因為外出賺錢較從事耕作容易維生，且其掙錢方式也影響其工作意願。因此儘管地廣人稀，移民返鄉後也往往無意開墾，[30]素有「地廣人少無米食的笑柄」。[31]貨幣經濟不發達，

---

27 吳萬鎮，〈海南島建省研究〉，收入張帆編，《海南島面面觀》（漳州：華聲通訊社，1947），19。

28 吳萬鎮，〈海南島建省研究〉，收入張帆編，《海南島面面觀》，20。

29 柴山武德，《海南島》，101。

30 臺灣總督府調查課，《海南島奧地旅行報告》南支那及南洋調查 220 輯（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21~22。

即使在勞力需求殷切的一九四二年，男子一日工資所得也不過三十錢，亦即相當於一小盒火柴的價錢。而當地人也寧可以物易物，據說最獲當地人喜愛的是火柴、石油、眼藥等實用物品。[32]

二、臺灣總督府對海南島之覬覦

如上所述，近代以來海南島曾有幾度發展機會，而日本（臺灣）則是與其發展息息相關的助力或者阻力。早在日本海軍南進論派重視海南島地位之前，臺灣總督府便已認識到海南島的重要性。一九〇八年五月，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技師素木得一首度前往探查，翌年四月殖產局囑託小西成章也為採集天蠶而至海南島。[33]及至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之交，總督府專賣局長賀來佐賀太郎為了確保製腦原料，派遣林業技師中井宗三前往與臺灣南部緯度相當的海南島北部，考察樟樹之生長狀況。隨後專賣局庶務課長池田幸甚也前往探查，並訪問了瓊崖鎮守使龍裕光（廣東督軍龍濟光兄）。當其時，正是以謀略著稱的明石元二郎就任臺灣總督時，他認為若能移植臺灣開發之經驗，則海南島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地位都將在臺灣之上。於是，專賣局事務官池田幸甚銜命多次來往於兩岸之間，成為與廣東方面折衝交涉的第一人。[34]

一九一九年十月明石總督死於任內，但是繼任的田健治郎總督也是重視對岸政策之人，從《總督府府報》中，可以找到池田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二〇年九月、一九二一年一月被派往「南支那及英領香港」出差的人事命令。在多次赴對岸的交涉中，池田的活動範圍甚至包括雲南，並促成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唐繼堯派遣訪問團來臺。而與廣東方面的交涉，儘管督軍龍濟光為莫榮新所逐，不過莫榮新政府似乎比前政府

31 《迅報言論集》（海口：海南迅報社，1943），18。

32 石山賢吉，《紀行滿洲臺灣海南島》，574。

33 田中長三郎，〈海南島の科學探險〉，《臺灣時報》233號（1939，臺北），278~279。

34 賀來佐賀太郎，〈臺灣と海南島—明石總督の海南島開發計畫〉，《臺灣時報》233號（1939，臺北），256~260。

更支持「中日提攜」以開發海南島，殷汝酈及彭程萬成為與臺灣總督府聯繫的窗口。此二人在訪問臺灣後，也親自走訪海南島，臺粵雙方就共同開發海南島事達成協議。[35]然而，如前所述般儘管總督府與廣東政府間達成協議，但經上海的新聞報導，軍政府出賣海南島的傳言使得群情譁然，廣東方面也不得不中止此合作協議。

共同開發案雖然流產，但是在此數年間，池田幸甚等人便以總督府樟腦專賣相關業務為由，頻繁的展開調查活動。如一九一九年七月起，池田與專賣局囑託村上勝太、技師笠島孝作前往探查；一九二〇年冬又與技師川上鐵藏等，前後數次赴海南島展開前後長達四年的調查活動。[36]與樟腦事業相關的業務是調查艾粉。艾粉是海南島之特產，因是日本人所發明的清涼劑「仁丹」、「千金丹」等之原料而價格暴漲。專賣局原來以價廉之樟腦精（龍腦）作為艾粉之代用品，但因龍腦效果遠不及艾粉，因而往赴海南島調查。[37]專賣局囑託村上勝太則自一九一九年七月起，至一九二二年三月返臺止，三次前往海南島調查，滯留時間約二年。其調查復命書由總督府調查課於一九二二年以《海南島事情　第三》之名出版。[38]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共同開發計畫未獲實行後，總督府的行動也暫時沈寂。居留海南島的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左右尚有四十九名，其後由於滿洲事變以後排日運動愈形激烈，日人益減。[39]以至一九三九年日軍攻占海南島時，日本人在海南島的代表人也僅有勝間田義久及其農場、旅館等相關營業而已。[40]至於臺灣人，有部分人似乎受到上述廣東

35 南洋協會臺灣支部，《大支那の片目：海南島體驗實記》（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1939），6~16。

36 南支調查會編，《海南島讀本》，19。柴山武德，《海南島》，19~11。

37 臺灣總督府調查課，《海南島事情　第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21），119。後藤元宏，《南支那海之一大寶庫海南島》（東京：武道社，1932），172。

38 臺灣總督府調查課，《海南島事情　第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

39 大西齋編，《香港と海南島　附澳門廣東廣州灣》（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111。

40 關於勝間田的活動及日本外務省、軍方及總督府對其支持，在臺拓的檔案中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可以看到日本運用此人以獲取諜報等之意圖。又，總督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

政府的獎勵開發之鼓動，如霧峰林家的林垂拱便曾經到海南島尋求機會。《林獻堂日記》中提到「次到二哥處，…與…劉庚雜談。劉庚兩日前歸自香港，述其同垂拱視察海南島，因中國政府頗警戒日本人之侵入，遂不能自由視察而返」。[41]臺灣人在海南島的實況頗難掌握，有資料提到：

> 近年有多數的臺灣籍民，一時先渡海到福建或廣東，而後再往南來此，依靠同鄉關係者而入居中部。由臺灣來此船費三十元，由於其風土與臺灣無甚差別，移住也不感痛苦。[42]

又有「海口除了藥材商勝間田洋行外，不過本島人（臺灣人）醫師數名而已」的資料。[43]此外，由於海南島當局對已是日本國籍的臺灣人存戒心，也有如澎湖島望安庄漁夫曾明權等八名，因機械故障漂流至海南島，被視為細作而被關入瓊山監獄的情形。[44]

與海南島相較，臺灣方面更早注意到海南島以南的南海諸島之利源。[45]前述一九二二年挖掘西沙群島燐礦一事，亦即假粵商何瑞年之名義向廣東申請開發之事。其始末為旅居高雄的平田末治於一九一七年探查西沙群島後，翌年九月起在鹽水港製糖會社社長楨哲的後援下，以南興實業公司之名於永興島（又稱林島、多樹島）修築碼頭、棧橋、輕便鐵路、貯水池、倉庫、工廠等，大事挖掘鳥糞。工人概由臺灣、琉球運來，鳥糞則篩淨裝運大阪製成肥料。[46]關於此事，在田健治郎日記中有

月，命勝間田義久為囑託，使調查礦業及農業狀況，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藏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252冊「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之9「勝間田義久海南島ニ於ケル產業調查事務ヲ囑託ス」。

41 《林獻堂日記》一九三七年（中研院台史所即將出版）一月二十二日條。

42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支那事變於ける帝國海軍の行動（其の二）續》，66。

43 臺灣總督府臨時南支調查局，《海南島調查書》南調第一號（臺北，1938），69。

44 火野葦平，《海南島記》（東京：改造社，1939），89~93。

45 南海諸島的涉外關係簡表，可參見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附錄部分。

46 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誌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76~77。符駿，《南海四沙群島》，132~133。柴山武德，《海南島》，174~177。

「池田事務官來申關多樹島燐礦經營問題之經過」（1921年9月25日）、「平田末治來述關多樹島（一名パラセル．リーフ）燐礦特許與廣東政府交涉之經過」（1921年9月29日）、「平田末治將航行西沙島燐礦調查，來述其計畫」（1922年1月14日）、「平田末治來述青〔西〕沙島磷〔燐〕礦開發之經過（1922年5月5日）、「朝，池田專賣局長來稟申粗製莫比賣下方法之件及西沙島磷〔燐〕採收經營之件等」（1922年8月23日），[47]足見以廣東人名義申請開發西沙島一事，總督府曾經與聞。一九二二年三月，臺灣總督府甚且派遣技師小野勇五郎及高橋春吉前往調查。只是一九二五年廣東發生排外的沙基慘案後，前後在此經營九年的日人才大多離去，僅留少數工人，及至一九二七年廣東政府派遣海瑞艦前往，方才盡數離去。[48]

南沙群島也因為燐礦資源而為日人所覬覦，最早的關係者也是平田末治。一九一七年平田初航至南沙群島後，日人便相繼前往探險，確認富藏鳥糞（燐礦），因而成立拉薩燐礦，並且於一九二一年開始於太平島（長島）挖掘。一九二九年左右因世界經濟恐慌，拉薩燐礦撤離。然而就在此時，法國宣佈擁有主權，並且派兵占領西沙三島及南沙六島。[49]平田見此，復於一九三五年出面集資，如同在西沙群島一樣，也在鹽水港製糖會社長槙哲支援下，成立了開洋興業會社。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占領海南島後，隨即進佔西、南沙群島。三月三十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三十一號宣佈，將改名為「新南群島」的南沙群島歸併入臺灣高雄。[50]

臺灣總督府在海南島雖無實質利益，但是對於海南島的關心卻與日俱增。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廣東省南部的北海發生日本人遇害事件，日本海軍軍令部內綽號「南洋王」的中原義正，即利用此次糾紛草擬了

47 參見〈田健治郎日記〉相關各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圖書館藏。

48 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誌略》，76~77。符駿，《南海四沙群島》，132~133。柴山武德，《海南島》，174~177。

49 符駿，《南海四沙群島》，175。

50 若林修史，〈昔今の島〉，《臺灣時報》234號（1939），191~203。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地歷研究室，《教材資料新南群島》（臺北：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39）。

「北海事件處理方針」，明記了「依情況也要保障占領海南島」，並且預期中日戰爭將會持久化。只是海軍方面的構想，不能獲得以石原莞爾為首的陸軍之同意，占領海南島的想法一時受到挫折。[51]儘管此項計畫沒能實現，但是與此同時，海軍實現了將海軍將領送上臺灣總督寶座的計畫。[52]據角田順的研究，一九三六年三月設立的「海軍政策及制度研究調查委員會組織」，由海軍次官長谷川清擔任委員長，將海軍南進的焦點集中在「重視臺灣」及「對抗英國」兩點上，[53]並且在長谷川清等奔走下，儘管臺灣軍司令部對海軍總督有所疑慮，[54]仍然利用臺灣鼓吹南進論的風潮，使預備役大將小林磯造出任臺灣總督。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海軍在臺灣開設了海軍武官府，由福田良三少將出任武官長，以兼「總督府御用掛」的身份，與在「南支南洋」調查上有相當累積的總督府官員，共同擬訂了「南支產業開發綱領」、「廣州處理方針」、「汕頭處理方針」、「海南島處理方針」、「南方外地統治組織擴充強化方針」等一連串的對華南政策。其中有設置「南方總督府」，由臺灣總督兼任南方總督，指揮監督臺灣總督、南洋廳長官及「海南廳長官」的構想。至於海南廳所轄的範圍，則包括「海南島、東沙島、西沙島及新南群島」。[55]

至於「海南島處理方針」方面，開宗明義的便表示：

---

51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現代史資料10（東京：みすず書房，1963）解說部分。

52 參見梁華璜，〈臺灣總督恢復武官制的背景—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變本加厲〉，《成大歷史學報》第22號（1996，臺南），59~90。

53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現代史資料10，解說部分。

54 時任臺灣軍司令的畑俊六，在其日記中表示了陸軍方面的疑慮。陸軍認為文官總督容易控制，海軍的武官總督反而有難與陸軍的軍司令官相處的疑慮。見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與八月十三日日記。而陸軍對海軍的不信任，也明顯的顯現在其日記中，如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條中，有對海軍陸戰隊佔領青島的評論，認為海軍憂慮青島為陸軍所佔領，一看到青島無敵軍便立即派遣陸戰隊豎立國旗，完全是為了獲得勳章而戰的。甚至有年輕的軍官喊出我們最大的的敵人是海軍的說法。伊藤隆編，《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續現代史資料4。

55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464~465。

> 鑑於海南島在軍事上、經濟上的重要性，以及其地理、社會的特殊性，關於該島的處理，自然與其它占領地不同，要以確立整體的統治實權，並擴充帝國對外地之統治精神為主眼。因之，1.該島的統治要活用臺灣統治的經驗，將其視為南方外地之一環而行之。2.藉該島之開發確保國策上必要之資源，以強化日滿支經濟提攜，並且藉以圖謀民生之康寧。3.以該島為中心，對東沙島、西沙島及新南群島要確立強力的支配權。同時，要統合加上臺灣及委任統治領在內的南方外地，使其成為一整體，以之作為帝國南方政策之前進據點，藉以強化、促進我國策之實行。[56]

亦即不僅將海南島視為永久的占領地，甚至進一步規畫其成為日本帝國的外地。在外地的施政上，以臺灣為範本，而其經濟發展，則是以作為日本帝國集團經濟的一環，以補足此經濟圈之所需為目的。在這個根本原則下，處理方針再區分為「應急的處理方策」及「恆久的處理方策」，在治安確立，交通、電氣等基本設施復舊之後，提出了相當驚人的處理要領：「1. 對住民的方策，以皇民化為本旨。2. 關於產業經濟的方策，整體上以計畫經濟為基調。3. 關於樹立具體的政策及運用方面，要活用臺灣的經驗，以大約十年便能獲得與現在的臺灣同等程度的統治成績為目標」。[57]企圖以十年的時間，便想達到與臺灣相同的「統治成績」，是基於對「臺灣經驗」的自負吧！而在臺灣統治了四十餘年後才正要進行的「皇民化運動」，能夠輕易的在占領地區推行？其想法也似嫌草率。以其「重要政策」中的國籍政策，規定「住民取得日本國籍的（方式），是依申請許可制」而言，讓二百三十餘萬的海南島民「皇民化」的問題，恐怕重點是在使該島成為日本帝國外地的一環，而非對住民處置的周密思考。至於產業發展方面，例如對「海南島原料資源的開發方針，採取以臺灣能夠處理、有利於臺灣工業化為原則」，試圖將日本與臺灣的殖民經濟關係移植到臺灣與海南島上。如鳳梨的栽植計畫在使增產低廉的下級品銷售中國及南洋，以不阻礙臺灣產的高級品之銷路為原則等，充

56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451。

57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453。

分的顯示了「臺灣本位」的想法。[58]

這個未定稿的方策，雖然不能遽以斷定為總督府官式的看法，但是，將海南島特殊化的看法，無獨有偶的也出現在國策公司臺灣拓殖㈱式會社加藤恭平的意見書中。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加藤恭平社長所提出的「南支開發ニ關スル臺灣拓殖㈱式會社ノ希望」（臺灣拓殖㈱式會社對於開發南支之希望）中，將臺拓之規畫工作，分福建省及海南島二部分說明。加藤認為福建省是日本之特殊權益地，而該地在日軍占領前，日方的財產遭到重大損失，因此須要求巨額之損害賠償。其方式是「樹立傀儡政權，並且由福大公司總攬」。但是，廣東省與日本無條約上的特殊關係，且英國擁有絕大的勢力，很難如在福建般樹立傀儡政權。因此，只能求將海南島納入勢力範圍。占領海南島之利益在於海南島之各項農、林、礦產資源豐富，亟待日本的開發。並且占領海南島符合日本的南進國策，基於國防上、軍事上、南方經營上及產業上之考量，最好能夠將海南島納入日本領土。若因顧及與英法之國交，則可使成立自治獨立政府，以親日派要人組織傀儡政府。至於產業、金融及其他對海南島開發的設施，則完全委任臺拓經營」。[59]顯示出臺灣高層想將臺灣經驗推行在海南島上躍躍欲試的心情。

對於日本企圖擴張在華南勢力的野心，中國方面早有警覺。如陳銘樞任廣東省主席時，已意識到日本的南進意圖，因此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刊行《海南島志》時，即指出海南島的國防地位是「西望安南，南控南洋群島，迤東則與菲律賓相望。北隔海南海峽，與雷州半島對峙。國防上經濟上，均占重要位置。西人嘗評海南、臺灣為吾國之二目，可以知其價值也」。[60]只是諷刺的是，該書經臺灣總督府技師井出季和太翻譯出版後，竟成為日軍占領時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又一九三七年五月《新

58 「海南島處理方針」全文見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451~463。

59 昭和13年1月，加藤恭平，〈南支開發ニ關スル臺灣拓殖㈱式會社ノ希望〉，見外務省記錄E-2-2-1，3~10，〈本邦會社關係雜件—臺灣拓殖㈱式會社〉。

60 陳銘樞總纂，《海南島志》，間接引自太田弘毅，〈戰前海南島における日本海軍の統治組織〉，《アジア文化》第7號（1982，東京），113。

生路月刊》第五至六期合集為「海南島特輯號」，即主張「從大局著想，瓊崖開發之急務在於國防上的建設與經濟上的開發」。一九三七年七月張維漢的《海南島》更加以深論，提出了十二點產業開發的方策。此書為總督府臨時南支調查局所譯，[61]同樣也成為日本認識海南島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三、海南島的日本軍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以及德國在慕尼黑會議外交成功的刺激下，提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法，迫使西方國家在遠東也做出重大的讓步。這種否定中國門戶開放、列強利益均霑的作法，使得美、英、法三國於十一月七日採取了自中國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平行行動，共同就恢復長江航行的問題，分別向日本提出內容相近的照會，英美兩國並且通過中國的政治性貸款。[62]就在這種局勢下，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起，日軍以切斷經由法屬安南及英屬緬甸輸送物資的所謂「援蔣路線」為名，開始對海南島發動攻擊。翌日蔣介石委員長發表談話，譴責日軍侵佔海南島的行動，無異是太平洋上之九一八事變。指出日本將海南島與關島、庫頁島視同為太平洋上的三個戰略要點；日軍之所以攻占海南島，不是其所宣傳的為解決中日戰爭的問題，而是為確保南進據點，以備日後與英美一戰。[63]之後，法國於十三日、英國於十四日、美國於十七日分別透過其駐日大使，質問日軍登陸海南島之事。法國國內甚至有應該趁機占領海南島，以保護中南半島上的法國屬地之說。[64]然而，抗議行動也僅止

61 青木茂，〈海南島の開發と臺灣〉，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8年版（臺北：南天出版社重刊，1996），218。

62 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1996），272~275。

63 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防衛研究所紀要》2：1（1999，東京），108。

64 南支調查會編，《海南島讀本》，171~174。長谷川了，〈海南島を繞る國際關係〉，

於抗議，英、法兩國為歐洲與意、德之紛爭而無暇東顧，海南島的中國軍隊無力抵抗，海南島實質上成為日軍的占領地。

日軍一方面繼續進擊中國，一方面扶植汪精衛政權以圖收拾中國戰場持久化的局面，對於海南島等占領區域，在形式上必須與汪政權協商。於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在「御前會議」中決定了「處理中國事變綱要」，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1. 蒙疆及華北三省駐紮軍隊，2. 在海南島及華南沿海特定地點駐紮艦艇部隊，並且在上述地區得以開發和利用國防上必要的資源。[65]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汪精衛政權與日本簽訂了「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其第三條規定：「兩國政府相約，對於足以危害兩國安寧及福利之一切共產主義的破壞工作，共同防衛之。…日本國為實行兩國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第四條規定：「兩國政府相約，在派遣於中華民國之日本國軍隊依據別項所定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對共同治安之維持緊密協力，在必需維持共同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事項兩國間另行協議定之」。又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政府允認日本國基於歷來之慣例及為確保兩國共通利益，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得駐留其艦船部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特定地域」。[66]依據此條約，對於「另行協議」的部分，則有「附屬祕密協約」，約定：

> 第一條：根據條約第五條的約定，日本國應將必要的艦艇部隊駐紮於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和華南沿海的特定島嶼以及有關地點，日本國艦艇得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的港灣水域自由出入、停泊。日本國和中華民國為確保兩國共同利益，認為有必要維持中國海的航線，保護

《海と空 臨時號》8卷5期「海南島專輯」（1939，東京），63。

65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15。

66 《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南京：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白皮書第一號，1940），2。

牠的安全。並根據條約第五條的規定，約定按照兩國間另外的協議決定，在華南沿海特定島嶼以及有關地點，進行緊密的軍事合作。

第二條：中華民國政府約定允諾，兩國緊密合作，籌劃開發廈門和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特定資源，特別是國防上必需的資源。關於以上的資源的利用，應考慮中華民國的需要，中華民國政府應對日本國和日本臣民積極提供充分的便利，特別應滿足日本國國防上的要求。[67]

而又針對此《附屬祕密協約》的約定，同意「1. 以海南島及其附近各島為省區，設置一省。2. 以廈門島及其附近為市區，設置廈門特別市。[68]在此協定下，日方名義上獲得汪政權對其入侵海南的事後追認。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陸海軍統帥部在攻打而不長期占領的共識下出兵海南島。[69]然而，當攻占海南島後，二月十六日在由海軍、陸軍、外務三省人員議定的〈海南島占領ニ伴フ政務處理要綱案〉（伴隨占領海南島而來之政務處理要綱案）中，確立「海南地方關係處理，由三省現地機關構成之陸海外連絡會議審議決定及實施」，要綱中並確認海南島的地位「一方面是作戰地區，同時將來在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也必需是帝國的特殊權益地區」。[70]在此方針下，在政治方面認為應「不特別實行軍政，政務的施行有待中國方面的自治」，因此僅促成「治安維持會」，而不積極樹立地方政權。在此要領下，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先於海口的會堂舉行「瓊山治安維持會」發會式，以賑恤白米及發給果糖的作法來吸引民眾。由曾任瓊山縣商會長、經營布店的韓仁豐出任

67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320~321。

68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325。

69 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防衛研究所紀要》2：1，121。

70 日本外務省記錄〈漢口廣東及海南島各方面重要事項處理ニ關スル件〉，收入《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五卷》，取自http://www.jacar.go.jp「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0096~0098。

會長。[71]

日軍對海南島的處置，在三月一日海口連絡會議所決定的「海南島施策要綱」中，有更具體的勾畫。首先是在方針上，設定海南島是「不受支那大陸影響，在帝國的精神指導下，漸次達成自立發展」的地區。因此，在政治要領上，認為原則須沿襲舊制度，於縣設「治安維持會」，並且儘量統合行政單位，設立最高機關。[72]

日軍的進攻海南島，雖出於海軍之策劃，但是占領行政，一時之間卻不容海軍獨佔。[73]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中央陸、海、外三省就海南島的政務處理，追認海口連絡處的決議，確認其方針為「首先將重點置於作戰之實施及治安之確保，同時以努力調查及獲得我國不足資源中急須對應之重要資源為目標」。其次在處理要領上，確定以「三省連絡會議」為政務關係處理機關。在政治指導上，則決定培植「治安維持會」，並且設定海南島的政治機關與「將來應該會設立的西南地方政權無直接關係」。[74]這個統合的機關「瓊崖臨時政務委員會」於七月十八日成立，由趙仕桓、吳直夫、詹松年等擔任政務委員。下設民生、秘書、財經三處。同時，由日本海軍第五艦隊情報部長擔任臨時政府最高顧問。[75]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軍將負責行政實務的第五艦隊情報部擴充，設立「海南海軍特務部」，隸屬於新成立的「海南島根據

71 火野葦平，《海南島記》（東京：改造社，1939），88、96。

72 日本外務省記錄〈漢口廣東及海南島各方面重要事項處理ニ關スル件〉，收入《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五卷》，取自http://www.jacar.go.jp「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0099~0100。

73 日軍雖然攻占海南島，但是最初並無長久占領的計畫。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的日記中記錄著：訪問中島鐵藏參謀次長雜談，海南島的作戰是在海軍不永久佔領的諒解下實施的，然而要其放棄似乎困難。我勸其海南島可以委任予海軍（1939年3月19日）。參見伊藤隆編，《陸軍畑俊六日誌》，188。

74 日本外務省記錄「漢口廣東及海南島各方面重要事項處理ニ關スル件」，收入〈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五卷〉，取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0116~0120。

75 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支配——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五年〉（一），《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9卷第2號~3號（2001，名古屋），62。

地隊」，成為最高統治機構。[76]而出任首位「海南島根據地隊」的司令官，便是前述主導臺灣總督府的「海南島處理方針」之海軍武官府福田良三武官長。[77]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日本海軍將原「海南島根據地隊」升格為「海南警備府」，警備府司令部設在三亞（參見附表一、附表二），下轄海軍特務部。[78]特務部最初只設「經濟局」，而後規模逐漸擴充。依據一九四二年五月的「海南海軍特務部令」，開宗明義的規定其「掌理海南島、南朋山及牛角山之有關處理支那事變之特務、各種調查及其他海軍關係要務」，以文職之司政長官為「總監」，其下設官房、政務局、地政局、經濟局、衛生局，職務分掌由海軍大臣另定之。並且於三亞、北黎、那大、嘉積設立特務部支部。[79]（參見附表三）

特務部又設「海軍軍法會議」，職權包括侵犯日本外務省的領事裁判權，即日本人犯罪問題的處理。在海軍的戰略構想下，有意排除陸軍省及外務省勢力，被認為有施行「總督政治」之嫌。[80]日本外務省對海軍的作法有疑慮的原因之一，是為避免引發與汪精衛政府的爭議。在前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汪政權與日方所簽訂的基本關係中，雖然不得不承認日軍以國防需求為名而占領海南島之事實，但是名份上海南島仍然屬於汪政權之國民政府所轄，日本外務省警戒海南島海軍當局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外務省如此警戒，但是對日本海軍而言，海南島

76 岸田健司，〈日本海軍の「南進」政策と海南島進出〉，《日本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年報》第 20 號（1990，東京），651。

77 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防衛研究所紀要》2：1，116。

78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軍事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75~76。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116~117。又，《海南省志》稱根據地隊為「基地隊」。

79 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117。太田弘毅，〈戰前海南島における日本海軍の統治組織〉，108~112。

80 〈海南島關係〉，外務省記錄〈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占據地內施政關係〉，引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5~20。

是唯一可以仿傚陸軍在「滿洲」般為所欲為的地方，在海南警備府與海軍特務部分擔警備及軍政下，成立一個可與臺灣總督府相匹敵的軍政機關，是海南島海軍當局的構想。因此，如同海南島的傀儡政權名份上隸屬南京的國民政府而不為汪政權所轄般，海南島特務部的預算雖然來自興亞院，卻也不是主管中國相關事務的興亞院所能管轄，[81]實際上完全是日本海軍的禁臠。

無論如何，海南島在實質上的最高行政機關海軍特務部之外，形式上仍然設立傀儡政權。日軍打出「瓊人治瓊」的口號，名義上屬於汪精衛政權的「國民政府」，但是並未隸廣東省管轄。傀儡組織分別為「瓊崖臨時政府」、瓊山縣政府、海口市政府及各地的治安維持會。臨時政府內置九名顧問團員（一縣一名），作為傳達三省會議意旨給臨時政府的橋樑。臨時政府政務委員、各縣治安維持會長、各機構之長皆由國民政府時期的各界鄉紳、名士組成。[82]

臨時政府之下，設有「瓊崖民眾自衛軍」，由詹松年任司令，[83]以維持治安。一九三九年八月，臨時政府內設警務廳，由趙仕桓、詹松年先後兼任廳長，全島各縣分設警務局，內設警務、保安、司法、經濟、衛生、高等科。一九四〇年十月，瓊崖臨時政務委員會警務廳為強化治安，增設海口、文昌、嘉積、瓊山、三亞、北黎、定安、澄邁等縣警務分局。並在文昌、定安、澄邁、萬寧、陵水等縣設立派遣所，在瓊山府城鎮開辦警察訓練所。培訓特務警察、密探，以各種公開或隱蔽的方法在碼頭、車站、戲院、茶樓、酒館、賭場等群眾集中處進行勦共情報活動。一九四二年初，「瓊崖臨時政府」警務廳改設警察廳。統轄全瓊政府的保安武裝力量（自衛軍），先後擔任廳長的有趙仕桓（兼）、吳直夫、詹松年。廳內設置二科、四室、一局、一直股，即第一（軍事）、

81 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117，125。

82 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支配——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五年〉（一），《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9卷第2號~3號，62~69。

83 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支配——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五年〉（一），62。

第二（治安）兩科；軍械、經理、軍法、政訓四室；海口警察局；情報股。擁有軍特二千餘人。主要負責搜集中共瓊崖黨組織、抗日游擊隊活動情報和管理社會治安。[84]此為日軍占領時期海南島政治組織之一般。

一如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占領地僅限於點線般，海南島的日軍占領地也止於沿海地帶，內陸地區則由「瓊崖守備司令」王毅、共產黨及游擊隊所控制，雙方衝突不斷。以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登陸海南島至翌年的一月底止言，雙方共發生一百九十餘次戰鬥，亦即平均每五日半便爆發一次規模不等的戰鬥，日軍死亡人數達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對此，日軍所展開的報復行動，除地面騷擾外，並以飛機輪番轟炸，據云遇害鄉民八千餘名，被焚屋舍一萬一千餘間。對於日軍在海南島的殺戮，香港的《大公報》報導，繼飯田祥二郎之後任司令官的太田奉湯表示，非將海南島人屠殺三分之二以上，則無法有效的統治該島。[85]一九四二年二月，雖有日本陸、海軍實施連合作戰，[86]執行所謂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87]但是日軍與抗日武力對峙的局面基本上並無改變。

總之，日本之占領海南島，主要的目的既然是設定在獲得南進軍事基地及資源的掠奪上，[88]上述的「維持治安」自然是重點。為了強化基地功能，展開三亞軍港、榆林商港之拓港及三亞都市建設、黃流軍用機場、八所至榆林之鐵路等建築工事。為了獲取資源，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海南島施策要綱」中，已經提到以農、畜、漁業及礦業為主，包括積極招致日本的資本及技術、大量生產日本所缺乏的熱帶特產作物、培

84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公安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7），7~8。

85 蘇雲峰，〈日軍在海南島之暴行，1939-1945〉，《海南歷史論文集》，165~166。

86 「海南島關係」，外務省記錄〈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占據地內施政關係〉，引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23~35。

87 R.T.Phillips,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ainan “, *Modern Asian Studies* 14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8.

88 曾任海南海軍特務部政務局長的藤原喜代間少將在其手稿中也表示，佔領海南島最重要的目的在於開發鐵礦。因此，表面上雖然設立了當地人的政權，其實是要採取類似臺灣總督府般的統治型態。參見太田弘毅，〈海南島海軍產業開發〉，《政治經濟史學》199（1982，東京），8。

養羊毛資源作為農家副業、扶助日本漁業往公海發展等項。在文化方面，則強調普及日語及設立職業教育，以及衛生機關的設立。至於金融方面，方針是漸進的使軍票成為基本通貨，要領則包括「為維持軍票的價值（公定市場為軍票一百對法幣一百三十），須採取促進本邦物資輸入，同時增進重要土產物品輸出本邦，藉使我方漸次實現獨佔貿易的措置」；並且將「入手的中國紙幣及白銀於上海兌換成英鎊或者美金，作為外匯儲存，以資軍票整理及本島經濟工作之有效運用」等。[89]儘管外務省所邀請的學者在調查海南島後，質疑軍票的效用，認為「軍票既然是否定既存通貨的措施，即等於否定住民的經濟；同時，軍票既然不是真正的貿易通貨，從貨幣職能來看也不及既有通貨」，因此認為「本島的經濟界既以物品為主體，當然須要採行以物品交易為主的措施。……由於通貨及物資兩面引起了物價的混亂，其對策是先由島外供給豐富之物資，並且確立島內的交易運輸，以期島內物資流通的圓滑。」[90]但是，海南島的軍票制度，如同其他的日軍占領區般，成為日本收奪當地資源的重要措施。

對於如何榨取海南島資源的問題，在三省連絡會議下設置了「農政委員會」，掌管海南島農政關係之企劃指導、監督及其他相關事務。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於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海南島農林開發的大綱。九月二十三日起復於海口召開第二次會議，更具體的討論資源開發議案。列名農政委員的是臺北帝大的田中長三郎，以及東京帝大的三浦伊八郎、春日井新一郎、山下知彥等教授，獲邀與會的公司則有日東拓殖、南洋興發、海南產業、臺灣拓殖、南洋栽培協會、伊藤產業、東洋紡績工業、田中商事等，前述提出「海南島處理方針」的福田良三及總督府技師也與會。農政會議的主題包括：1. 審議農業計畫及實施計畫。2. 各公司之事業分擔。3. 各公司多角經營中副業的種類。4. 各公司試種地的分配。5. 農業林業及畜產等的地域分配。6. 各公司事業適合地點

89 日本外務省記錄〈漢口廣東及海南島各方面重要事項處理ニ關スル件〉，收入《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五卷》，取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影像0102~108。

90 野口彌吉等，《海南島農業調查報告》（東京，外務省通商局，1940），104。

之分配。7. 確立指導海南島民方法。8. 土壤調查。9. 農業移民。10. 土地問題。11. 種苗之準備。12. 肥料。13. 氣象。14. 資本。15. 灌溉（農林、土木）。16. 研究機關等等項目，具體的規劃著占領地的農林開發之計畫。

對於農產品種類的栽植，農政會議認為應該以生產日本所缺乏之熱帶資源，如橡膠、埃及棉、麻類、可可椰子、單寧原料、雜纖維等為主，其次才是其他地方也能夠生產之有用植物。又規定各公司皆需獨自經營，以明確責任之歸屬，不得採取共同經營、共同出資之方針。各公司以接受三省連絡會議指令的方式進行試種。[91]

一九四〇年二月，在日軍占領海南島一周年前夕的第三次農政會議上，具體的指定及分割土地。獲邀參與者及指定作物如下之表列：

一九四〇年農政委員會指定事業分配表

主作 橡膠	南國產業、スマトラ拓殖、ブリジストンタイヤ、山崎商店	副作 橡膠	大日本製糖、伊藤產業、帝國製糖、日東拓殖、東洋紡績、野村合名、明治製糖、南洋興發、臺灣拓殖、梅村商店
主作 棉	鹽水港製糖、東洋紡績、南國產業、大日本製糖、臺灣拓殖、南洋護謨、山崎商店、スマトラ拓殖、梅村商店、明治製糖、ブリジストンタイヤ、南洋興發		
主作 麻	日東拓殖、古川拓殖、梅村商店、南國產業、帝國製麻、明治製糖、海南產業、鹽水港製糖	副作 麻	伊藤產業、山崎商店、南洋護謨、鈴木商店、スマトラ拓殖、ブリジストンタイヤ、南洋興發、福田組、大日本製糖、帝國製糖、臺灣拓殖
主作 油脂料	日本油脂、梅村商店、資生堂、福田組	副作 油脂料	山崎商店、鈴木商店、鹽野義商店
主作 藥用香料	武田商店、三共、鹽野義商店、福田組、鹽野香料、小川香料店	副作 藥用香料	伊藤產業、梅村商店

91 外務省記錄海Ⅰ，2，5-1〈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海南島關係—海南島農林業開發關係〉第一回及第二回農政會議議事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主作林業單寧用材	伊藤產業、大日本製糖、日東拓殖、帝國製糖、山崎商店、鈴木商店、野村合名、南洋興發	副作林業單寧用材	南國產業、臺灣拓殖、東洋紡績、南洋護謨、森永製鞣、スマトラ拓殖、梅村商店、鹽野義商店、帝國製麻、東臺灣咖啡、資生堂
主業畜產	臺灣拓殖、田中商事	副 業畜產	大日本製糖、帝國製糖、鈴木商店、古川拓殖、梅村商店、資生堂、森永製鞣、野村合名、帝國製麻、明治製糖、鹽野香料、福田組

並且依據上述指令分配事業地點。[92]

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為止，總計有三十二家會社獲准參與農林開發事業。其事業地點及開發情況，於《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歷史的調查》的報告書中，有詳細的說明，此處不再重複，只討論幾項根本問題。

首先是地點的分佈是紙上談兵。對此問題，滿鐵的調查報告早在第二回農政會議後便提及，認為這種未親臨土地，只是就紙面資料就分割作業地點的作法，將來可能會有悲劇。[93]果然，被指派到澄邁縣北部種植罌粟的「福田組」完全失敗，不得不撤出海南島。而日本軍方為了以鴉片收入充當鎮壓海南的軍費，指令「厚生公司」繼續福田組的事業，並且特別自內蒙招來罌粟專家及川勝三以指導栽植。但是，無視那大之所以為海南島傳統的罌粟栽植地之原因，而任意指定栽植地點的結果，即使高薪禮聘「蒙疆」的罌粟專家也無法解決。而及川所遇的罌粟種子為螞蟻所侵害的事件，也是其十數年經驗所未及者。[94]這又顯示出寒帶經驗不見得能適用於熱帶之問題。

此外是土地的取得以及指定農民配合栽培的問題。日軍占領海南島與日本因條約割讓取得臺灣的情況不同，綏撫政策的重要性使其必須更間接的進行其資源掠奪的企圖，對於開發時間遠較臺灣早的海南島，有

92 外務省記錄海Ⅰ，2，5-1〈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海南島關係—海南島農林業開發關係〉第三回農政會議議事錄。

93 是安正利，《產業上ヨリ視タル海南島》（東京：滿鐵調查部，1940），107。

94 江口圭一，〈日中戰爭期海南島のアヘン生產〉，《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7（1992，名古屋），117~136。

著與臺灣相同的土地權等複雜的關係。在必須承認既有土地權的限制下，各公司如何取得土地以經營是個困難的問題。對此，日軍的作法是頒布「海南島不在者財產處理令」，規定地主或管理人所在不明者，由軍方管理，而六個月內不出面申告者，則將土地沒為官有。而後由軍方撥付會社使用。此外，在「海南島土地處理要綱」的規定下，還允許各會社不論其直營事業地是否有地主，都可以視為「海軍用地」而使用。[95]在強佔土地之外，還有以「宣撫」為名強行要脅住民配合栽植者。如上述栽植罌粟的厚生公司，在要求地方維持會會長配合無望的情況下，不惜撤換治安維持會長。[96]

農林開發的另一項問題是栽植作物種類的決定。占領之初，農政會議認為應該以生產日本所缺乏之熱帶不足資源為主。然而，一九四二年後日本在東南亞戰場上所向披靡，與新占領區相較，海南島熱帶作物的栽培價值便受到質疑。例如總督府在一九四二年調查報告中，便已對橡膠栽培的必要性質疑。報告中指出，海南島的橡膠成長至得以採取汁液時間，大約需要九年，東南亞只需六年，且所得汁液也不過是東南亞的六至七成。而隨著戰爭的擴大，原來處處仰賴日本內地或臺灣物資的海南島，也必需逐漸講求物資之自給自足，例如將農、林、畜產品或地下資源等加工以供應所需。[97]這種情形不限於農林業，在礦業方面也是如此。如那大地方之錫礦曾指派三菱礦業經營，但是隨著日本東南亞占領地的擴大，那大的錫礦不如馬來，因此三菱礦業便不復經營。[98]

在文化方面，日軍占領海南島後，海南島的小學一時之間全部閉鎖，而後隨著「治安」的平定而陸續開設日語學校。海口、瓊山等縣則先依

95 水野明，〈日本海軍の海南島占領支配——1939-1945年〉（二），《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9卷第3號，104~106。

96 江口圭一，〈日中戰爭期海南島のアヘン生產〉，《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7，126~127。

97 市川信敏，《海南島の工業現狀並に工業原料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2），38~39。

98 《海南島の工業現狀並に工業原料調查報告書》，23。

據舊有學制，恢復小學教育。對於海南島的初等教育，重點在於日語、教養及勤勞教育三方面。[99]而日語的教科書則為臺灣總督府所發行的《日語捷徑》及臺灣教育會發行之《新國語讀本》。至於中等教育方面，則在瓊崖臨時政府成立（1939年7月）時即訂定〈瓊崖中學校設立綱要〉，計劃於瓊山縣城內前廣東省立師範學校之舊址設立瓊崖第一中學校。而實際上瓊崖第一中學的復學則遲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即使是日軍的御用新聞《海南迅報》，也表示「雖有稍遲之嫌，亦不算太晚，可以急起直追，章程、校長、教員也已決定，雖有不滿足的地方，在回復之初，亦不必講斤論兩，可以逐漸改善」，[100]不滿之情，躍然紙上。

在前述的〈瓊崖中學校設立綱要〉，規定教育目的為：1. 灌輸東亞共榮之理念，養成智德體群四育之健全發展。2. 以實業教育為基準授以必需之知識技能。3. 養成勞作習慣，以培養現代中堅之國民。[101]而對於中國人教員，則加以再訓練，以期其能夠成為「充滿東亞共榮理念」的新海南島之教育者，燃燒著「建設善良的島民社會，使成以皇國為中心之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氣魄。[102]《海南迅報》則闡述其意為「新的教育，要順著時代轉換的潮流，本著中日和平親善合作，東亞各國各族友好共榮，進而建設世界新秩序與全球人類同享天福的理想。換句話說，要與世界同化並與天地同流，這是頂天立地無偏無邪的東方精神。所以要施行精神的教育，人格感化的教育，全體統括的教育，務求實際的教育，造福人群的教育。」[103]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在文教措施方面，日軍亦有訓練青年之舉。據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海南迅報》所載，謂「瓊崖於年前，友邦駐瓊

99 水野明，〈海南島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9卷第1號，125。

100 《迅報言論集》，129。

101 水野明，〈海南島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 49 卷第 1 號，123。

102 水野明，〈海南島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 49 卷第 1 號，125。

103 《迅報言論集》，130。

山之某陸軍軍官，亦曾有訓練青少年之實行，彼僅擔任警衛地方之責任之友邦軍官，對吾瓊之青訓工作，既能如斯注視努力，然則吾瓊人對此，又豈可不更加努力推行」。[104]並且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六日成立「海南文化協會」，謂「基于東亞建設四大綱要『文化溝通』之精神，以中日兩國為中心，負文化建設之使命，使東亞各民族，有一種共同一致之新文化，以為建設新東亞之基礎，於是其重要一翼之海南文化協會，乃由此應運而生。茲者本島中日兩國文化界先進，為應時事之需求，以為建設新瓊崖之基礎起見，爰發起組織海南文化協會，得各方協力援助之下，已于本日成立，集中日之文人，聚兩國之學者，濟濟一堂」。[105]

這些宣撫及文教措施似乎也有某種程度的作用。戰後前往海南島的觀察者發現：

> （日本）強迫民眾兒童讀習日文之週報（敵情報局編輯，內閣印刷局發行，紙質優良，印刷精美，每期五錢，賤價發售）。筆者曾於一間半家庭半商店之飯館發現數本之多，可見其深入民間。且於所謂「日語捷徑」之日本字母旁，有以鉛筆註以漢字者，諒係兒童所寫，以便讀音者，當地民眾受毒已深。當淪陷期間，居島外者且有隨時返家居住，實比國內淪陷區者為多。即以敵人投降一事言之，筆者曾問所接觸各階層，上為公務員，下至工人、水手、女招待，他們均不稱敵寇投降，而謂「和平」之後，對于日寇發生之惡感，尚不及對臺奸之深。[106]

此段敘述正是日軍宣撫作用的最好例證，同時也反映臺灣人處境之困難。

四、臺灣對海南島軍政的配合

當日軍一攻陷海口時，海軍出身的臺灣總督小林磯造立即發表聲明

104 《迅報言論集》，300。

105 《迅報言論集》，313。

106 周天鑑〈海南島面面觀〉，收入張帆編《海南島面面觀》（漳州：華聲通迅社，1947），4。

表示：

> 海南島與臺灣之間從相當早以前便有許多交涉，往年鼓吹南進論時，前輩們對海南島的開發似乎花費了相當多的苦心。占領後的海南島將會如何呢？這點本來就不是我們所能夠預想的，然而可以想見不論如何都一定會成為親日防共地帶，因此在臺灣的人不要使先人的苦心化為烏有，應該大大的考慮朝這個方向進行。至於總督府當局，只要軍方有所要求，當然會基於地理上各種有利的條件，大力的支援軍方的活動。[107]

果然，日軍於二月十日攻占海口後，二月二十二日總督府便命派駐廣東的事務官數山英一、總督府屬新田定雄，以及博愛會事務相關的技師小林義雄、河田幸一等立即前往海南島，並有臺灣拓殖會社社員二名、臺灣銀行行員一名同行。在與海軍、陸軍、外務「三省連絡會議」商議後，決定了臺灣總督府分擔的應急措施。包括：1. 由博愛會派遣醫療防疫班，並設立附設研究機關之醫院。2. 開設臺灣、海南島間定期航線。3. 實施各種基本調查。4. 設置熱帶產業實驗機構。5. 開設日語學校。6. 派遣電影宣撫班。7. 由臺拓經營建築事業及公共汽車事業。8. 設置臺灣銀行海口出張所（辦事處）。[108]與一九三八年總督府內部擬定的「海南島處理方針」相較，在應急措施方面，如醫療防疫、交通運輸、宣撫、金融、調查、教育等項皆與「方針」所擬相似，[109]顯示「方針」的擬訂具有實質意義。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總督府事務官大田修吉等人搭乘首航的定期輪「めなど丸」，前往海口開設總督府事務所。事務所的任務為擔負與三省連絡會議及其他派駐機關之配合工作，博愛會等總督府關係的諸施設及調查團的統括，臺銀、臺拓等臺灣關係會社、銀行、商社的統制連絡，臺灣關係者的指導斡旋等事務，以及有關海南島之諸般調查。[110]總

107 南支調查會編，《海南島讀本》（東京：1939），162~163。

108 臺灣總督府，《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246。

109 角田順解說，《日中戰爭 三》，451~453。

110 臺灣總督府，《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246~247。

督府所配合的應急事項，具體來說主要有醫療衛生、交通運輸、基本調查、日語學校、以及宣撫宣傳工作等相關事項。底下主要依據臺灣總督府於一九四〇年所刊行的《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中日戰爭期間總督府對華南之施策狀況）資料，加以整理敘述。

首先是醫療衛生方面。分派部分在廣東的博愛會衛生班，加上自臺灣派遣之要員，組成「海南島派遣防疫衛生班」，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抵達海口，設置「博愛會南支派遣衛生班海南島支部」，五日至瓊山設置診療所，其後又在三亞等地開設診療所，從事防疫診療。五月十八日開設三亞醫院及崖縣分院。其後又擴大醫療範圍至文昌、那大、儋縣、新英、豐盈、定安、烈樓、仙溝等地。衛生班之業務除一般診療外，下設防疫部負責傳染病患者收容、預防注射、家屋消毒、帶原者檢查（中國人餐飲業者）、瘧疾原蟲帶原者調查、死因調查、寄生蟲調查、鼠類檢查、水質檢查等衛生相關事項。[111]

其次是交通運輸方面。包括1. 定期航線。四月十日起，由臺灣沿岸航路船「めなど丸」航行基隆、海口間，必要時也使巡迴至三亞；又使臺拓所有的「金令丸」從事臺灣、廣東、海南島間之航行。2. 通信設施，敷設廣東、三灶島、海口間之海底電線之陸線部分，並且設置一座一千瓦短波無線電信機。開設海口電報局，由總督府派員經營海口電報局及海底電信局，並且協助「國際電氣通信㈱式會社」架設電話線。3. 郵局。總督府派遣副參事、書記、交通主事及雇員、郵務士等擔任海口第二百三野戰郵便局要員，至於中國方面的郵局業務，則由總督府遞信部派員以憲兵隊所屬軍屬身份檢查郵件。4. 應海軍之要求，將基隆水產練習所練習船「南鵬丸」作為海南島南北交通用，主要為海口、三亞之間。其後以總督府新造的警務局警邏船「開南丸」更替。5. 開設臺北、海口間定期航空。

第三是海南島基本調查方面。總督府與海軍省等協商結果，展開下述調查：1. 農產、畜產、特產及土地關係。派遣技師高澤壽等六名前往調查，擬訂熱帶產業試驗所及畜產改良試驗所，並且對三省會議提出與

111 整理自臺灣總督府，《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

農畜產業開發相關之計畫，以及有關土地改良之根本方針及調查計畫。[112]2. 鹽業關係。由五名臺拓人員及四名大日本鹽業社員組成調查團展開調查，並有專賣局副參事川越順市之參加，實施海南島沿岸各地之鹽業調查。3. 港灣關係。由海軍水路部、內務省及總督府組成合同調查團，總督府方面成員有交通局參事鶴為彥、技師山下繁造、技手川村卯三郎及醫師二名參加。總督府提供水產試驗船照南丸，至榆林、清瀾、海口、新英等主要港灣調查。4. 都市計畫及道路關係。交通局技師篠原國憲等踏查南北各地，樹立道路計畫。5. 近海水產及漁場調查。以「照南丸」及「南鵬丸」等作數次調查，決定以榆林港為中心發展漁業。

第四項是開設日語學校。由軍方直接實施，總督府提供文教局所編纂之《日語捷徑》、《日語教本》等教材，後又有臺灣教育會發行的《新國語教本》。[113]其後總督府又應海軍特務部之請，自臺灣徵調五十名小學的現任訓導前往推廣日語教育。[114]

第五是宣撫宣傳工作。1. 應海口報道部之邀請，於一九三九年八月派遣「共榮會映寫班」至海南島。共榮會是總督府之外圍團體，由總督府及民間有力人士共同組成。主要業務為社會教化，藉著宣傳、宣撫、電影、演劇等形式以介紹「南支南洋」事情。隨著日軍侵略地域的擴張，共榮會的業務範圍也隨之擴大。在海南島的常設機構有印書館、電影院等。[115]2. 協助《海南迅報》，由於該報無懂日語之翻譯記者，故自一九三九年三月起由總督府外圍組織「善鄰協會」派遣通譯一名前往協助。[116]

112 在總督府檔案中，有份年代不明的「海南島土地調查計畫」資料，觀其內容，推斷是在日軍初佔領海南島北部瓊山時總督府所擬定者。內容參考臺灣的土地調查事業，提出全面或部分地區調查的規劃，內容及調查方式基本上都源自臺灣的經驗。由時間來看，推論與高澤壽技師等人的調查相關。不過，海南島終究未曾施行這種確定土地關係最重要的基本調查。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521 冊 39 號文件。

113 水野明，〈海南島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愛知學院大學教養部紀要》第 49 卷第 1 號（2001，名古屋），127~130。

114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臺北，1943），174。

115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81~182。

116 整理自臺灣總督府，《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戰後，有人觀察《海南迅

總督府除了在應急措施發揮作用外，也自認在「異民族統治、熱帶農林業、熱帶醫學」等領域所累積的知識經驗，都能在必要時立刻投入「南方建設」。[117]以人力而言，臺灣總督府的官員擔任了特務部民政方面的主要成員。這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原總督府文教局長，被陸軍徵調為爪哇軍政監部司政長官的西村德一所言般：「軍方對於占領行政，求助於有統治異民族經驗者，北方為朝鮮總督府，南方為臺灣總督府。特別是占領地行政重心之警備警察及農耕產業指導」，是極合理的做法。西村甚至對自日本內地派遣至占領地的人員之舉措極不以為然。[118]

總督府派遣至海軍特務部的「軍政要員」，包括教育關係、日語學校、農林、畜產、水產關係、專賣關係、電氣通信關係、度量衡關係、產業試驗場、植物檢查所等各方面。特別是需要熱帶殖民地行政經驗的教育關係、農林、畜產、水產關係、土地制度、專賣制度、衛生制度等，幾乎全部為臺灣所派遣者，其人數幾達海軍特務部職員的半數。以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初期的海軍特務部為例，政務局第三（文教）課長林彥太郎本為總督府視學官，政務局第二（調查）課長山木毅一郎為原總督府事務官，經濟局第一（農林水產）課長矢野謙二為臺北州事務官，第五（金融）課長為臺灣銀行的石川正純，衛生局長為臺北帝大教授兼總督府技師下條久馬一，衛生課長松本留吉為總督府地方技師等。[119]地政局成立後，也由歷任總督府地方課長、事務官、臺中州知事的資深官僚水越幸一出任其長。[120]透過這些官員與總督府間的聯繫，多項「臺灣經

報》銷售情形，謂於各酒館菜店及小販攤多能得之，可見其普遍情形，此與其廉價發售以資宣傳有關，該報出四開白報紙一張，至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止出至一七〇六號，內容多日本大本營發表及東京來電。見周天鑑，〈海南島面面觀〉，收入張帆編，《海南島面面觀》，4。

117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63。

118 西村德一，〈長谷川總督と齋藤長官〉，收入寺崎隆治編，《長谷川清傳》（東京：長谷川清傳刊行會，1972），349。

119 海南海軍特務部組成，見〈海南島政務概況〉，外務省記錄《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占據地內施政關係，海南島關係》，10~11，引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

120 太田弘毅，〈戰前海南島における日本海軍の統治組織〉，《アジア文化》第 7

驗」很自然的輸出到海南島。

比如佔總督府歲收重要地位的「專賣事業」在海南島的施行便是一例。海南島鴉片制度的確立，背後有總督府專賣局的技術指導，海南島也成為臺灣鴉片銷售的市場。[121]由於總督府對其「成功的鴉片漸禁政策」沾沾自喜及實質專賣利益之利誘，[122]以及日軍有以鴉片收入充當「維持治安」所需費用之意圖，[123]總督府積極協助鴉片政策的作法自是理所當然。此外，總督府也以其獨特的「天日製鹽技術」，派遣專賣局技師等五名協助開設鹽田。[124]

以米糖為主的農業及相關食品工業的發展是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主軸，此產業經驗也適用於海南島。長久以來，海南島一直脫離不了前述人少地多卻米糧不足的困境。因此，增產稻米成為占領軍解決糧食問題的第一要義。為此，總督府於一九四〇年先在臺灣拓殖會社的陵水農場試種蓬萊米稻種，「結果收穫量及品質均優良，得畝產三百七十五市斤，比本地種顯著增產，後在瓊海、儋縣等地積極推廣蓬萊稻臺中六十五號、嘉南二號等專供日本人吃用。」此蓬萊稻「每町（十五市畝）產三千公斤，比本地品種增產百分之三十。」[125]為推廣蓬萊米的栽種，總督府先於一九四一年派遣一百二十名農民充當技術指導員，翌年又派遣「農業指導挺身團」員一百一十二名，以栽植臺灣的在來米種，增產稻穀供應海南島當地人之需。[126]除了米作外，蕃薯也是重要的糧食作物。據一九三六年廣東省森林局統計，海南蕃薯耕地面積四五點一萬畝，收

號，108~110。青木繁，〈海南島でお迎えして〉，收入寺崎隆治編，《長谷川清傳》，309。

121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97。

122 參見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鴉片問題〉，《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223~254。

123 江口圭一，〈日中戰爭期海南島のアヘン生產〉，《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7號，120。

124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98。

125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農業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7），55、116。

126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90~191。

穫量三百四十萬石。與一九三七年臺灣的三千九百五十一萬石相較，僅有其十分之一。但在引進臺農二七號、臺農十號後，在同一條件下，比本地種增產一倍以上，遂漸漸普及於民間。[127]可以說是臺灣農產經驗成功的移植。

在醫療方面，一九四二年八月，海南海軍特務部總監向總督府提出培養從事防遏瘧疾之技術人員之要求。對此，總督府募集了五十名成員，每個成員都在接受六個月的學術及實務講習後轉至臺北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在為期兩週的訓練後派赴海南島。不過，以博愛會為主的醫療體系，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起，其所有的財產卻全部無償的讓渡給「同仁會」的海南島支部。此乃源於殖民地臺灣的主管機關拓務省與日軍在中國之占領區的主管機關興亞院之間的協議，[128]就此，也可看出殖民地臺灣在對外擴展中自主性受到限制之一端。

號稱成功的臺灣「警察行政」也是移植的重點。在日軍的要求下，總督府自臺灣各州派遣警察三百二十名組成警察隊，從事治安及保甲工作，[129]並且指導在海口市外瓊山設置警察訓練所。[130]

在調查事業方面，臺灣方面除了會社自行調查者外，主要有殖產局官員等的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完成了十七冊的《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調查報告書》（見下表）。其次是臺北帝國大學兩回的學術調查團，項目包括生物學、農學、地質學、經濟及民俗、理農、農藝化學等項目。[131]此外還有財政及稅制調查、工業原料及工業狀況調查、生藥材料調查等。[132]而在調查之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臺北帝大的南方資源科學研

127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農業志）》，116。

128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53~54，179。

129 海南海軍特務部組成，見〈海南島政務概況〉，外務省記錄《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占據地內施政關係，海南島關係》，10~11，引自「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

130 山崎光美，《海南島一周產業經濟視察記》（臺北：臺灣總督府衛生部，1942），30~31。

131 臺北帝大對海南島之學調查，參見鄭麗玲，〈臺北帝國大學與海南島—以海南島的學術調查為中心〉，《臺灣風物》49 卷 4 期（1999，臺北）。

132 青木茂，〈海南島の開發と臺灣〉，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 18 年版，227~229。

究所也在海南島設置實驗室，由參與第一回學術調查團的平劫恭介擔任所長。[133]

殖產局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一覽（據《殖產局調查團報告書》）

第一回調查班（1940年8月23日　9月12日）

土壤及農業一般	府農業試驗所技師所長	農學博士	澀谷紀三郎
作物	府農業試驗所種藝科長	農學博士	加茂巖
畜產	府農業試驗所畜產科長		蒔田德義

第二回調查班（1940年11月14日　12月23日）

土地制度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		奧田彧
畜產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	農學博士	山根甚信
土地改良	府技師	府內務局土地課	八田與一
特用作物	府技師	府棉作指導所長	三浦博亮
畜產	府農業試驗所技師恆春畜產試驗支所長	農學博士	葛野淺太郎
園藝作物	府農業試驗所技師鳳山熱帶園藝試驗所支所長	農學博士	江口庸雄
甘蔗	府技師	府殖產局特產課	江良義文
土地制度	府事務官	府殖產局農務課	山分一郎
林業	府技師	府殖產局山林課	武田義夫
	府林業試驗場技手	恆春支所長	山田金治
	臺北帝大助手		李添春
	府技手	府殖產局農務課	前田長太郎
	府糖業試驗所技手		有門博樹
		府殖產局農務課	花岡尹人

第三回調查班（1941年2月14日　3月15日）

米作	臺北帝大教授	農學博士	磯永吉

133 鄭麗玲，〈臺北帝國大學與海南島—以海南島的學術調查為中心〉，《臺灣風物》49卷 4 期，57。

農政	府技手	府殖產局農務課	鈴木進一郎
	府技手	府殖產局農務課	前田穗濤

第四回調查班（1941年4月12日　4月19日）

產業	府殖產局長		松岡一衛
	府屬	府殖產局	衛藤棟吾

此外，在民間開發會社的關係上，臺灣也一樣扮演重要角色。日本在南方占領區最大的投資為石碌鐵礦之開發，承擔工事的是開發鴨綠江水利著稱的日本窒素肥料會社。擔任海南島開發事業部次長的河野司在回顧中談到：日軍占領海南島後，在海軍主導下，有多數資源調查團自內地前往，日本窒素肥料會社的朝鮮部隊也是其中之一。海南島的開發上臺灣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務部的官員過半數是臺灣總督府關係者，形成民政主軸。民間事業方面也以臺灣銀行、臺灣拓殖為首，臺灣的主要事業、商社前來創造了新的海南島，使經濟、金融方面的大為活絡，獲致成果，名符其實的建設第二個臺灣。其中，最大的事業堪稱為石碌礦山的開發，此為海軍特務部盡全力支援的大事業。開發石碌的四大工事分別是在沙岸邊開築可以同時容納兩艘一萬噸級船舶裝載鐵砂的港灣（八所築港）、建築自港灣至礦山間六十公里餘的鐵道（八所鐵路）、建設開發用電源的水力電氣發電廠（昌江水力發電廠）、以及礦山的最新採掘技術設備，是為南方最大的開發工事。開發的工事雖然由日本窒素擔任，但是支撐將近三萬名員工生活的食糧、物資之供給、金融等背後的機構、營運，則幾乎全由臺灣事業團擔當。而直接與開發面相關的也有數百名於現場監督的要員、醫師、護士等參加，臺灣可以說是石碌開發的後方基地。[134]不僅如此，開發鴨綠江水利的日本窒素之所以到海南島，也有著臺灣淵源。因為說服其常務理事久保田豐往海南島探勘的安部孝良，原本也是臺灣總督府的土木技師。而最初協助日本窒素至海南島調查水力發電的，也是借自臺灣電力的二十名臺灣人員工。[135]並

134 河野司，〈長谷川總督と海南島〉，寺崎隆治編，《長谷川清傳》，295~297。

135 河野司，《海南島石碌鐵山開發誌》（東京：石碌鐵山開發誌刊行會，1974），23~28。

且，由臺灣總督長谷川清遠離任地親臨海南島視察一事來看，也可以推知總督府對於臺灣在海南島的占領行政上所處的地位之重視。

在參與開發海南島的指定會社中，與臺灣關係最重要的是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會社，在海南島從事農林、交通、畜牧、建築、製冰等多角的經營。臺拓之經營將另文討論，此處僅談其餘相關者。據總督府的調查，獲海軍指定參與開發的會社，許多為在臺灣有拓墾經驗者。其他一般商社商人，除三井、三菱等之外，大概也都是臺灣關係者。最初約一千名的居留民，大部分也是由臺灣前來。所需物資由臺灣搬入者也多，就是參與貿易的統制機構「交易公社」的，也多與臺灣相關者。[136]光是一九四〇年總督府調查所及者，就有經營海口港的貨物搬運的海南運輸公司，以飼養、輸出天蠶為業的臺灣野蠶會社，棉布商竹腰商店，買賣黃麻及天蠶的下宮商行，修理販賣摩托車、自行車的中央公司，販賣攝影器材的富士洋行，攝影業的福原洋行，雜貨批發小賣的石黑商會、福田洋行，印刷及攝影業的海南印刷局，販賣椰子及油脂原料的海南熱帶油脂公司，攝影的大和寫真館、旭寫真館，旅館業的海口HOTEL，製造糕餅的鹽山製靄部，食堂浸河屋、第一食堂、新高食堂、蓬萊食堂等，自臺灣前來。[137]此為一九四〇年之所見，其後「如熱帶農業用種子、農工具，開發之物資動員資材如製米機、赤糖製糖機等，日用生活物資如米、砂糖、青果、日用雜貨等，多來自臺灣」。「各地之雜貨商、飲食店、旅館、鐘錶店、照相館、理髮店、洗衣店等中小雜商業幾乎全數來自臺灣」，[138]海南的部分地區，似乎成了小臺灣。

不過，最能顯現臺灣經驗在海南島發揮作用的，莫過於農政事業及與此相關的調查事業了。如何開發海南島的富源以為日本所用的課題，隨著海南島於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地位之變遷而改變。就此，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太平洋戰爭前後。前期海南島的經濟發展是置於「日滿中經

136 山崎光美，《海南島一周產業經濟視察記》（臺北：臺灣總督府衛生部，1942），21。

137 臺灣總督府，《支那事變ニ伴フ對南支施策狀況》，276。

138 青木茂，〈海南島の開發と臺灣〉，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 18 年版，231。

濟圈」來考量，因此擔負著提供上述經濟圈所缺乏的熱帶栽培作物、礦務資源等的使命。如三省聯絡會議下的「農政委員會」之決議，便初步認定海南島應該以生產日本所缺乏之熱帶不足資源，如橡膠、埃及棉、麻類、可可椰子、單寧原料、雜纖維等為主，其次才是其他地方也能夠生產之有用植物。[139]然而，一九四二年以後隨著日本在東南亞戰場上的所向披靡，海南島所能生產的熱帶栽培業如橡膠等，便失去其特殊性及重要性，日本海軍特務部甚至下令開發會社終止橡膠的栽培。[140]

此種局勢的改變，在各種調查報告中也可以看見，如一九四一年前的報告多主張熱帶作物的栽培，如滿鐵調查部也主張農業計畫應以熱帶作物橡膠、埃及棉、麻類、可可椰子、雜纖維為第一要義，米等作物為第二要義。但他們同時都因土壤、氣候及勞動力不足等，對海南島的農業抱持相當悲觀的看法。[141]這之間仍然堅持應該以「米」、「糖」為中心的是總督府殖產局的官員。鈴木進一郎在調查海南島農政後，認為以米糖為中心農業不但適合海南島本身的自然條件，並且以臺灣的經驗而言，最容易提高海南島農業生產技術。他對「臺灣經驗」充滿信心，認為日本初領有臺灣時，臺灣「土匪」、「生番」之害，以及衛生條件之不良絕不會優於海南島，日本當初之國力與技術也與今日大相逕庭，加以有在臺灣數十年之實驗，優良品種可以直接移植，經驗豐富的製糖會社可以面對開墾的諸多問題。[142]言下之意，海南島可以在短期間成為第二個臺灣。而臺灣之農業經驗不僅止於海南島。如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的新聞載：「我當局鑑於馬來米糧不足自給，新近將臺灣種稻穀移植

139 外務省記錄海Ｉ，2，5-1《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海南島關係—海南島農林業開發關係》第一回及第二回農政會議議事錄。

140 山崎光美，《海南島一周產業經濟視察記》（臺北，臺灣總督府衛生部，1942），29。

141 見是安正利，《產業上ヨリ視タル海南島》一書所收其他包括明治製糖、海南產業、南支派遣軍調查班囑託松尾弘等對海南島之農業皆持悲觀看法。外務省通商局所發行的野口彌吉、藤原彰夫、高橋晴貞調查的《海南島農業調查報告》（東京，1940）亦認為現實上的海南島不能稱作寶庫，將來唯有賴開發會社如何投資。

142 鈴木進一郎，《殖產局調查團報告書》十六（農政）（臺北：總督府外事部，1941）。

至馬來栽植，業已日漸有成果。」[143]這是對臺灣農業發展最好的肯定。

不過，就臺灣總督府而言，臺灣經驗所能夠發揮的絕不止於上述事項，在此將以移民事業為例，以見總督府自負之一端。當一九三九年第二回農政會議時，「海南島移民計畫」提出如下的規畫：首先，移民之方針乃儘量加速促使日本人移植，以使「日中經濟提攜」得以落實，並且扶植日本人確固不拔的堅實勢力。在實施要領上，則是1. 為開發資源，在農業、鹽業、林業及畜牧業方面，應該儘量由自內地溫暖地方（沖繩、鹿兒島、熊本、高知、和歌山縣等）移入的移民與海南島民共同開發，勞力不足時則以臺灣人補充之。2. 礦業方面可由內地移民及海南島民開發，至於勞力不足時，可由臺灣及大陸的中國人補充之。3. 漁業勞力之不足者，由海南島民補充之。4. 關於商業及金融業方面，使有能力之日本人自由進出，並且獎勵海南島民的發展，儘量抑制大陸的中國人移入海南。5. 土木建築工事所必須的勞力可利用海南島民，同時儘量招致內地日本人、臺灣人，對有希望永住者則予以特別考慮。6. 移民之實施在礦業方面由該當產業會社負責；農業方面原則上由政府施行，眼前則暫委產業會社執行；又農業、漁業等有希望單獨移民者，則給予適當的統制。[144]

依據此方針，海南島將於五年內移入日本人二十萬人，亦即每年將移入四萬名日本內地人。有實際官營移民經驗的總督府，面對此空疏的想法，則折衝將該移民業務委託臺灣拓殖會社承辦，所需資金則由總督府支援，[145]並且由總督府派遣農業技術人員指導增產米糧，代為訓練移民等。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所提出的「海南島農林開發應急施設（案）」中，具體列出海南島米十萬石之增產、農事試驗所之設置、海南島日人農林企業巡迴指導技術員之派遣等提案。並且表示「派遣本邦唯一對熱

143 鈴木政，《大東亞に於ける米》（東京：白揚社，1943），314。

144 外務省記錄海Ⅰ，2，5-1《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海南島關係—海南島農林業開發關係》第一回及第二回農政會議速記錄。

145 在臺拓的案中，可以看到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以加藤恭平社長之名提出的「事業資金借入認可申請ノ件」，其中總督府認可以補助金一百萬圓委託臺拓經營移民事業。詳見臺拓檔案 1426〈海南島農業開拓民ノ經營委託ニ關スル件〉。

帶農業有技術及體驗的臺灣之技術人員，以之對農林業施行適切的技術性指導，正可以促進軍方所期待的開發會社之事業進展，同時也可以達成我南進據點臺灣之使命於一端」。[146]總督府的自負，正是日治時期臺灣經驗輸出、臺灣與南進關係的最好寫照。

五、結語

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六年半期間，海南島在日軍的占領下，據說遭到屠殺及餓死者總數達五十四萬人以上；[147]而以軍票所換取者及直接掠奪的鐵礦等資源，其數更難以估計。然而，五十年後的海南人，在清算、控訴侵略者的掠奪之外，也正視了其所留下的資產。例如最近海南官修的省志中，對日本所留下的「遺產」也有正面的評述。[148]這些遺產當然不是日軍善意的投資所得，只是在戰爭時期不計成本的非常投資，[149]好不容易在一九四三年左右才規模粗具，卻因戰事逆轉，日軍在太平洋上節節敗退，迫使非常投資，即使重要如鐵礦資源也無法如預期般運出，設備因而被迫殘留。而諷刺的是，日本為侵略所留下的遺跡，當完整的移交給接收的國民政府時，竟然遭其「劫收」。由於「戰後日本人於海南留下相當可觀的物資、財產與交通設備…導至各軍政單位，紛紛搶先來到海南，爭奪日本人留下的這塊肥肉。在短短半年中，換過三四次以上的接收單位…在羅氏抵任以前，許多設備與物資已被搶劫一空」。[150]

而在上述的「遺產」中，臺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殖民臺灣

146 外務省記錄海Ⅰ，2，5-2《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海南島關係—海南島農林業開發關係》

147 蘇雲峰，〈日軍在海南之暴行，1939-1945〉，《海南歷史論文集》，174。

148 參見海南省地方志辦公室編的《海南省志》各篇以及《海南之最》等書，1990 年代刊行。

149 如對田獨及石碌兩鐵山周邊事業的投資，完全是戰爭時期為求獲取鐵礦資源而不符成本的行為。參見河野司，《海南島石碌鐵山開發誌》。

150 蘇雲峰，〈抗戰勝利後的海南政經社會〉，《海南歷史論文集》，176。

四十餘年後，的確是累積了極為深厚的「臺灣經驗」。當日本再度對外侵略，帝國之「正式的殖民地」在帝國之位置，於是從「外地」轉成為擴大的帝國領域之內部，此時殖民地的經驗便充分發揮其作用。本文在前言時提到，在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過程中，「臺灣因素」發揮了一定的效用。以海南島而言，儘管臺灣總督府沒有外交權，然而在日本本國「南進政策」確立之前，臺灣總督府在海南島所展開的一連串調查行動，以及與海南島（廣東）當局間的交流，已經為日本的擴張奠定良好的、並且是唯一的基礎。由海軍與總督府共同擬訂的「海南島處理方針」，便是最好的寫照。因此，在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中，「臺灣因素」不可忽視。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經驗，實大有助於其「大東亞共榮圈」之統治。

而自臺灣史的角度言，日治時期臺灣、臺灣人於華南、東南亞等地的活動，則可以說是附著、從屬於日本之臺灣「對外發展史」的一章。臺灣的地位，隨著日本的對外關係而改變，總督府的施政重心也因之有所變動，南進論與皇民化、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口號便是眾所周知的成例。當日軍侵佔華南時，臺灣被認定必須脫離以米糖為主的傳統殖民地經濟，轉而成為日本本國資金、閒置機械的投資地。而當一九四三年時，總督府認為臺灣在「大東亞戰爭」下發揮「不動的航空母艦、巨大的兵站基地、綜合軍需廠」的功能，為達此目的，更積極的試圖振興尚未脫離萌芽階段的臺灣工業；而臺灣製糖業的閒置器械，也在海南島找到新的出路。[151]這種日本—臺灣—海南島的「重層」的結構，不止在產業、經濟面，在人的層面上也表露無遺。在輸出「臺灣經驗」上，處於日本帝國底層的臺灣人，被動員了將近兩萬名，[152]他們或者充當軍通譯、軍夫等，以配合日軍控制當地住民；或是充當海南島應急米增產指導員、

151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154~160。

152 據說日軍佔領期間，投入兵力五萬餘人，其中臺灣人日本兵約占五分之四。又有日本投降時在海南的人力約四萬人，其中日本軍人及平民共 22681 人，臺灣人 14560 人，餘為朝鮮人之說。分見蘇雲峰，《海南歷史論文集》，174~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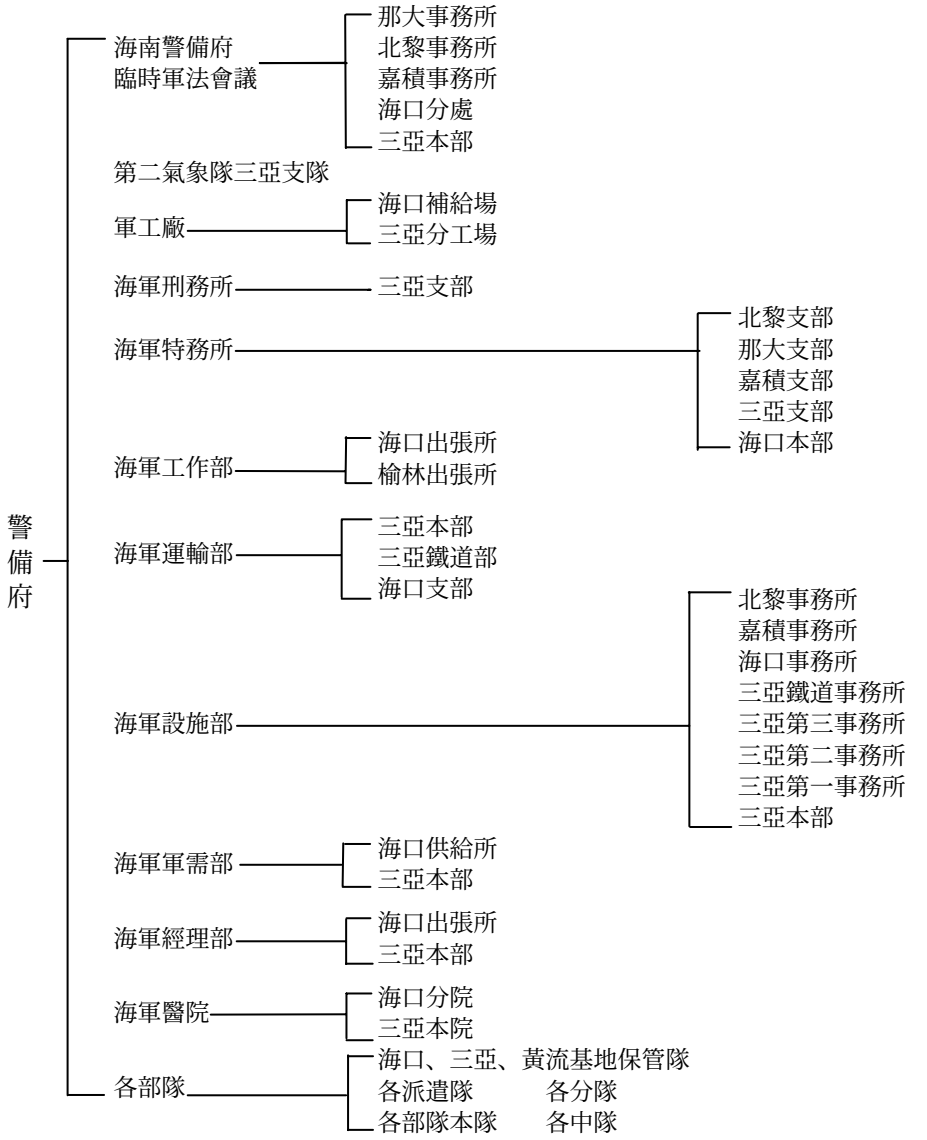
農業挺身團員。[153]他們以被殖民者的身份隨著日本的在海南島的「再殖民」而成為「殖民者」的協力者，充滿諷刺的譜下臺灣史對外關係上重要的篇章。

最後，在此要再次透過「臺灣經驗」內涵的檢討，重新反省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如同前述，總督府自認在異民族統治（包括教化、保甲及警察制度）、熱帶醫學、熱帶產業及調查研究等方面有成，也積極的輸出其統治經驗。然而，如上所述般，臺灣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地位，以及「重層」的結構從未改變。如殖民地本質的經濟在「大東亞戰爭」時雖然有工業化的呼聲，但是隨著一九四四年臺灣「戰場化」的準備，所謂的工業化只局限於煤炭的挖掘，臺灣經濟的「後進性」並未改變。[154]臺灣在海南島最重要的鐵礦資源之「開發」上，之所以只能扮演後方支援、基地功能的角色，正是臺灣殖民統治成果如實的反映。而在人員的層級與位階上，儘管臺灣人業已「皇民化」，也與日本人同樣的繳納血稅（志願兵及徵兵），但是並未改變殖民與被殖民者從屬的階級關係，這就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的本質。只是諷刺的是，被動員的臺灣人，卻也因為歷經了日本的殖民統治而一定程度的「皇民化」，在海南島的政權交替時，也經歷了苦澀的局面。關於臺灣人的問題，留待另文討論。

153 青木茂，〈海南島の開發と臺灣〉，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 18 年版（臺北：南天書局重刊，1996），226~231。山崎光美，《海南島一周產業經濟視察記》，30~31。

154 參見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 19 年版，201~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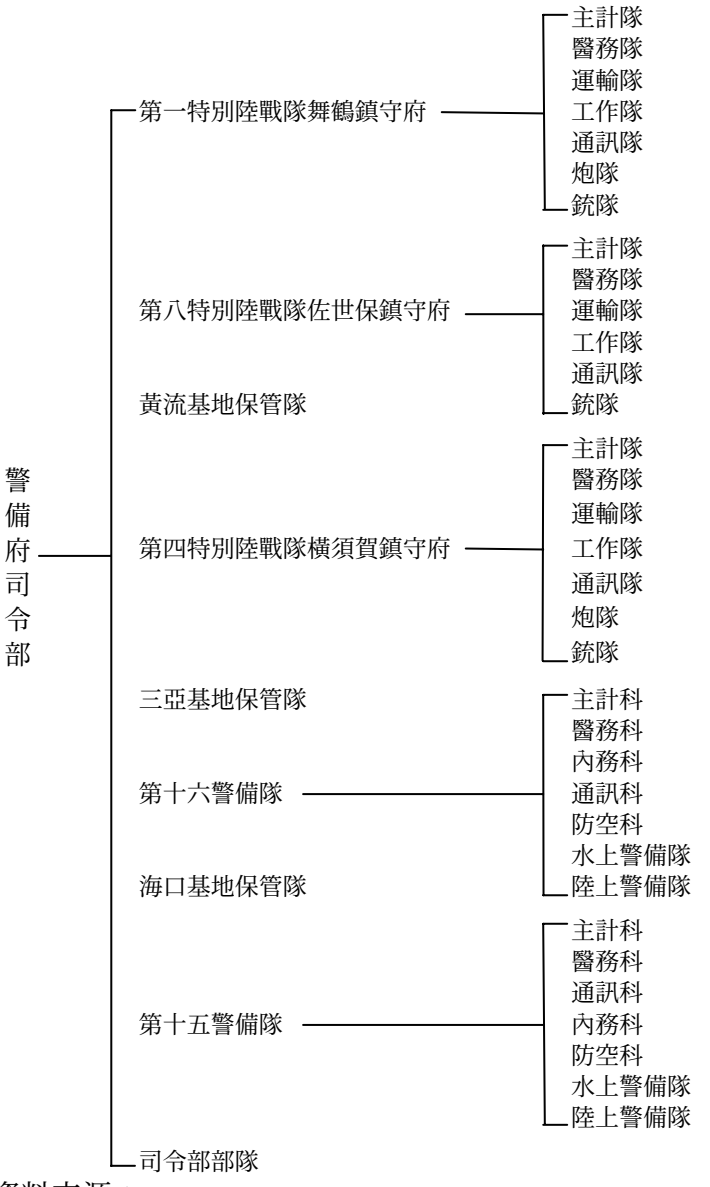
附表一：日軍海南警備府組織



資料來源：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軍事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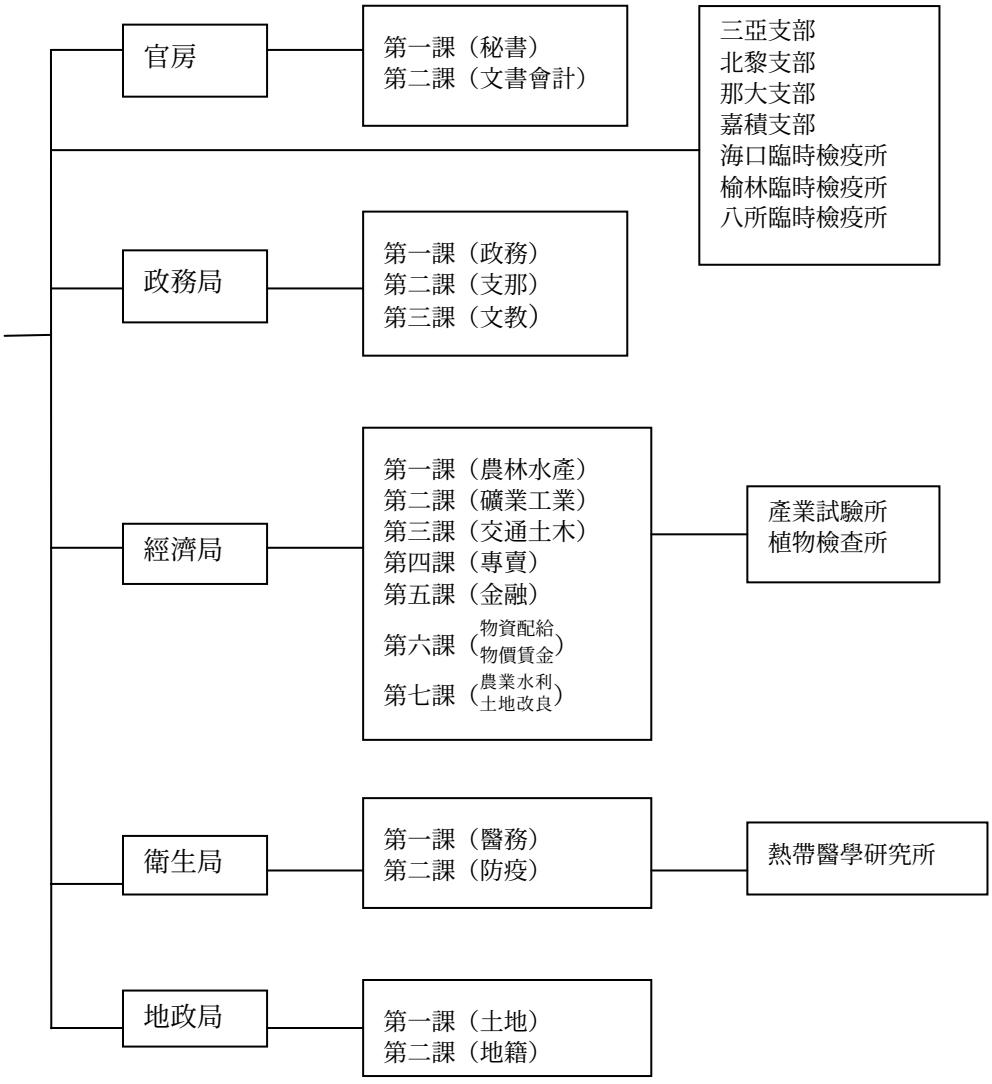
附表二：日軍海南警備府司令部編制



資料來源：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軍事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附表三：日軍海南海軍特務部組織



資料來源：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海南省志（軍事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太田弘毅，〈戰前海南島における日本海軍の統治組織〉《アジア文化》第7號，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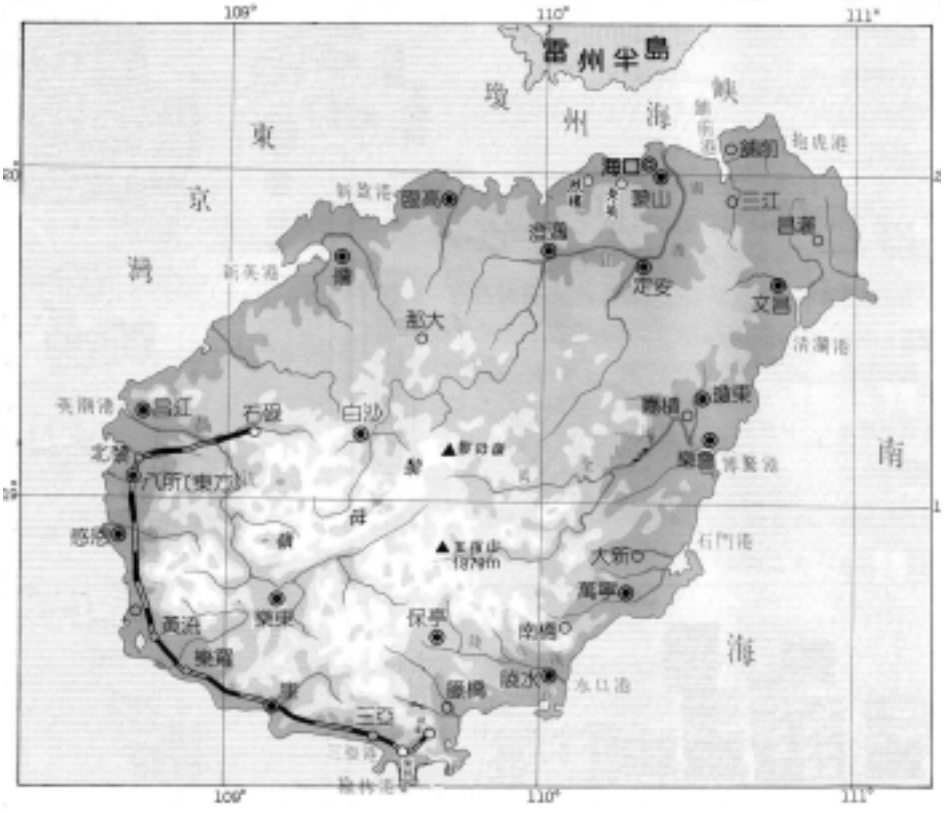
附表四：臺灣（日本）海南島關係簡表

1908.5	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技師素木得一至海南島探查採集天蠶
1909.4	殖產局囑託小西成章至海南島探查採集天蠶
1916-17	專賣局技師中井宗三至海南島探查
1917	專賣局事務官池田幸甚至海南島探查
1919.7	總督府專賣局囑託村上勝太至海南島調查二年
1920.8	廣東政府為海南島開發計劃邀請總督府實地探查
1922.1.	有林鶴壽被擬為海南島總督之傳言
1937.	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至海南島北部採集土壤
1939.2.10	日本海軍攻佔海口，由北而南陸續攻佔定安、文昌、清瀾港
1939.2.14	日軍攻佔三亞、榆林港，由南而北攻佔洋浦灣、新英、儋縣
1939.2.22	總督府事務官等自廣州至海南島
1939.3.4	「南支派遣衛生班」一行二十五名出發前往海南島
1939.3.10	臺灣合同鳳梨會社海南島調查隊出發
1939.3.16	於瓊州監獄獲救的臺灣漁民八名返回馬公
1939.3.30	新南（團沙）群島編入高雄市
1939.4.1	總督府事務官大田修吉於海口開設總督府事務所
1939.4.1	博愛會南支派遣衛生班海南島支部於海口、瓊山設立醫院
1939.4.1	めなど丸定期航行基隆、海口間
1939.4.8	總督府派遣無線電信機器材料及人員於海口設置電報局
1939.5.18	博愛會南支派遣衛生班海南島支部於三亞、崖縣開設醫院
1939.5.24	總督府新南群島調查團出發，六月十九日返臺
1939.9.3	自新竹州選出七名蔬菜栽培指導員至海南島
1939.9.6	臺北帝大醫學奉仕團一行自海南島返臺
1939.10.11	海南島訪日視察團一行回程順道訪臺
1939.10.12	森岡二朗總務長官赴海南島慰問日軍
1939.12.11	總督府促成海南島出漁團，第一班六艘船自高雄出海
1940.5.13	瓊崖民眾自衛軍司令官詹松年訪臺
1940.5.16	海南島開發團、鐵道團出發
1940.7.9	臺北帝大學生奉仕隊海南島派遣奉仕團五十餘名出發八月三十日返臺

1940.8.23	總督府殖產局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第一回調查班赴海南島，九月十二日返臺
1940.10.1	海南島學童使節團訪臺
1940.11.14	總督府殖產局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第二回調查班暨臺北帝大海南島學術調查團出發
1940.12.23	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一行海南島調查團與臺大班成員同時返臺
1941.1.18	南海興業（東洋產業、東京製鋼、大阪壽重工業、日產化學、菅興業合資，1940.10 於臺北成立）發表海南島開發計畫
1941.1.22	海南物產（三井、臺灣合同鳳梨、神戶水垣商店合資）發表海南島事業計畫內容
1941.1.23	總督府殖產局舉辦海南島調查團報告會
1941.1.24	臺大等海南島地質調查團一行出發
1941.1.24	臺北州海南島皇軍慰問團自高雄出海，三月七日返臺
1941.2.14	臺北帝大早劫一郎等海南島地質調查班出發
1941.2.24	總督府殖產局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第三回調查班出發，三月十五日返臺
1941.3. 16	獲准進出海南島之二十八會社組成海南島農林聯合會組織，委員長由臺灣拓殖出任
1941.3.21	海南物產於海口設立工場
1941.3.26	臺大文政學部決定派遣海南島調查團
1941.3.28	日本油脂發表利用椰子及海棠於清瀾港設廠之油脂工業計劃
1941.4.2	臺北帝大海南島地下資源調查團市村教授一行返臺
1941.4.10	海南海軍警備府於三亞開設，實施實質上的軍政
1941.4.11	總督府松岡一衛殖產局長視察海南島，四月十九日返臺
1941.4.12	總督府殖產局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第四回調查班出發，四月十九日返臺
1941.5.2	臺拓與大日洋行合資創設開南航運，以開設海南島沿岸航路
1941.5.15	大日本製糖會社發表於海南島設置五所改良糖廍計劃
1941.6.3	大日本製糖會社決定於海口、儋縣、那大設置事業所
1941.6.4	臺灣與海南島之定期航路決定由東亞海運經營
1941.6.15	海南島公共汽車委由臺拓經營
1941.6.28	日本油脂決定於海南島設置工場

1941.7.10	臺銀海南島出張所開業
1941.7.14	臺大學徒團前往海南島
1941.7.22	拓務省拓南局高橋課長發表海南島移民計劃之視察談話
1941.8.18	臺大學生勤勞報國隊一行自海南島返臺
1941.9.28	海南島公路循環路線開通，臺拓達成劃期的交通事業
1941.10.26	總督府博物館舉辦海南島博覽會
1941.11.3	臺灣日日新報設置海口支局
1941.11.16	大日本製糖會社之製糖酒精諸設備決定移轉至海南島
1941.11.27	南日本汽船獲得臺灣海南島航路經營權
1941.12.13	拓務省決定由臺拓承擔海南島試驗移民事業
1942.1.24	為增加海南島米穀生產，決定由臺灣派遣農業指導團前往
1942.2.6	南日本汽船於海南島新設出張所
1942.2.8	臺灣青果決定於海南島設置出張所
1942.2.10	總督府募集農業移民，以開發海南島農業
1942.1.30	與臺灣關係深厚之日東拓殖以三井農林之名新設南方開發部
1942.4.21	福大公司決定自十一月起於海南島著手鐵工業
1942.4.29	總督府高澤技師返臺，表示海南島畜產有望
1942.4.30	海南島海軍特務部總監池田清抵臺，就海南島之發展發表談話
1942.5？	臺灣ゼニスパイプ會社於北黎著手建設日本窒素所須的電柱工場
1942.7.31	臺北帝大出版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書
1942.7	臺灣官民受委託開始海南島農業基本調查
1942.7	臺拓獲拓務省補助二十五萬圓於榆林設立內地人移民訓練所，預計收容一百名
1942.8.9	臺灣農業挺身團內地人技師十二名臺灣人指導農夫百名前往海南島
1943.5	長谷川清臺灣總督視察海南島
1943.11	臺北帝大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開設「海南島實驗所」

海南島地圖



*本文的完成，要特別感謝水野明、吳文星、吳玲青、張存武、許雪姬、陳娓湲、陳慧宜、湊照宏、湯熙勇、劉素芬等先生及兩位審查人在資料及修正意見等方面的協助，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陳怡宏　校對：陳泳翰　汪正晟）

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Japanese Colonial Experience on Taiwan and the Occupational Administration on Hainan during the WWII

Chung, Shu-ming*

Abstract

After the 10 Feb. 1939 invasion into the northern city Haiko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 Hainan was unde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rmy until the end of the WWII. We know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main aim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ainan . The first aim was to get the nat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iron, to support the war effort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other one was to construct a stepping stone for the following war with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study the way the Japanese colonial experience on Taiwan influenced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Hainan.

What wa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xperience on Taiwan ("Taiwan Experience" in the paper)? It outline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xperiences on Taiwan,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hat I put focus on concern the resource investigation, tropical medicine, "police administration", special propaganda, economy building, etc. During the occupation,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was handled by the special department of the Japanese naval force on Hainan.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half the special department staff on Hainan came from Taiwan or were had some experience of Taiwan affairs makes the author wa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Taiwan experience influenced the Hainan civil administration and how go it.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aiwan Bank and other major corporations on Taiwan invested in Hainan under the Japanese Authority directions, making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Hainan become “the second Taiwan” in Japanese eyes. The rice-sugar productivity policy in Hain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occupation was said to be a transition or copy of their Taiwan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or copy of Taiwan experience brought the “Taiwan agriculture and Japan industry” colony character to Hainan too. We can also see the limited character of the colony Taiwan in the facts that the capital and people from Taiwan was not able to play a major active role in the Shilu iron mine or other industries.

Keywords: colonization, re-colonization, Hainan,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outhward advance policy.